



当代文献史料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Document

# 社会主义 历史研究动态

2023

2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Academy of History and Documentation of  
Social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社会主义历史研究动态

## Newsletter for Socialist History Studies

(季刊)

2023 年第 2 期

主 编 满 永

执行主编 王中颖

责任编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立民 王中颖  
刘 莉 杨 芳  
罗 燕 岳 伟  
韩 栋

排 版 王中颖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当代文献史料中心

# 目录

◎ 总论·····	1
○ 论文·····	1
· 通论·····	1
· 人物·····	9
· 理论·····	14
○ 图书·····	16
◎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学·····	19
○ 论文·····	19
· 中共创建与大革命·····	19
· 土地革命·····	32
· 抗日战争·····	35
· 解放战争·····	49
○ 图书·····	52
◎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	57
○ 论文·····	57
·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57
·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64
○ 图书·····	71
◎ 改革开放史·····	74
○ 论文·····	74
○ 图书·····	81

○	国际社会主义史·····	8 3
	○论文·····	8 3
	○图书·····	9 3
○	海外新论·····	9 5
	○论文·····	9 5
	○图书·····	1 1 3

# 总论

## ○ 论文

### 通论

《外向发力：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的发展简论》，《开放时代》2023年第3期

作者：吴毅、汪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现代爱国主义是因应“nation-state”（国民国家/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精神与情感，以优先建构国民权利抑或国族权力，爱国主义呈现出“内向发力”与“外向发力”两种类型。型塑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是中国人民为争取中华民族国家独立对强权国家的抗争，这决定了爱国主义“外向发力”的特征与效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爱国主义从属于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在对美国、苏联的斗争中，阶级革命的话语仍然透射出外向发力的国族抗争政治。80年代，体制、知识界与大众层面的爱国主义共同叠拼出多元内向的图景。90年代以来，外向发力的爱国主义愈益为体制意识形态倚重。在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需要均衡“nation-state”意义上的“国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发展，以爱国主义的内向性建构优化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国民-国家关系，化解困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

《革命与超越：“人民”概念的中国化》，《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作者：杨东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青年研究员）

摘要：现代国家源于人民的普遍承认，人民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启蒙思想家把人民视为享有自然权利的抽象个体之聚合，是理性视域下的公共人格。马克思超越了启蒙思想家的抽象认知，从理性领域深入到社会历史中，把人视为受到经济社会关系束缚的人，阶级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形成的阶级联盟就是人民。在革命进程中，人民概念在毛泽东的界定下实现了中国化。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与阶级联盟性质的基础上，人民概念有助于区分朋友与敌人、判定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来源、社会动员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为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语境下，人民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本体与动力，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迈向更高历史阶段的倚靠力量，是历史本质得以真正实现的推动力量。

### 《重访“大分流”：澄清中西历史和现实中两大不同农业演变模式》，《东南学术》2023年第3期

作者：黄宗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摘要：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和李伯重最近承认，自己过去坚持中国和西方经济的“大分流”要到 1800 年之后方才出现是错误的，但他们仍然坚持，在农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自己原来的论点是正确的。18 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农牧结合模式和中国的单一种植模式有着根本性不同，掌握两者的差异才能认识到两国过去和未来发展出路的不同。坚持两者的相同和相等性只可能继续导致错误的认识和抉择。中国农业（和其政治经济总体）所走的历史、近现代和当代的实际道路都不可能和西方一样。直面两者间基本不同的实际，才可能真正认识到符合中国如今和未来所需要的发展出路。

《民主集中制中国化的早期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作者：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列宁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开拓，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党的组织原则的逻辑起点。在革命战争条件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践从集中化到布尔什维克化，再到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走过了一个“之”字形发展过程，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中国化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基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特征，深入考察中共一大到七大的会议文献，鲜明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解决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坚持不懈地丰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逻辑与实践特色。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集中制中国化的早期实践，对于“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建构，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话语体系及其变迁(1921—2021)》，《浙江学刊》  
2023年第3期

作者：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摘要：政治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本文运用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献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百年(1921—2021)政治话语体系包含了七个核心要素，即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社会主义、人民、领导、民主，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认识的核心，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民主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将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结合起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的变迁，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理解分为革命时期的军事政治、改革初创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改革深化时期的全面政治三个阶段，表现为由革命向改革转型、由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转型、制度

化不断加强的特征。

**《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机制》，《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作者：宋健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理论掌握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这一方法论的同时，还从意识形态建构的维度开辟了具体实践路径，形成了完善的意识形态建构机制。该机制包含着意识形态的生产、具化和教化等具体方面。其中，意识形态生产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思想供给机制，通过理论、概念和规范的生产，发挥着精神引领、知识体认和价值规约的效用；意识形态具化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思想转换机制，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的转换，起到表征指认、集体实践和文化熏染的作用；意识形态教化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思想引导机制，通过思想教育、舆论引导和学习动员，充当学校引导、社会引导和组织引导的路径。在意识形态生产、具化和教化的逐层推进中，理论掌握群众得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情感运用的历史演进、道德语法与基本经验》，《学海》2023年第2期**

作者：朱楷文（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运用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相适应，在保证党的事业和各项工作获得成功的同时，自身也取得了重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情感运用通过情感启蒙，以情传情，唤起革命豪情，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情感动员，以情释理，激发斗争激情，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情感管理，以理驭情，培育发展热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情感治理，融情于理，凝聚复兴至情，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扎实前进。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运用能够克服情感自身局限，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蕴含着一套“服务人民”“一心为公”“实事求是”“省察克己”的道德语法。统而言之，党的情感运用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坚持方法性和目的性相统一，坚持合情性与合理性相统一，坚持情感社会化与情感制度化相统一。

**《中共革命语境中的“浪漫”言说》，《人文杂志》2023年第5期**

作者：叶培林、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在近代中国革命语境中，中国共产党人笔下的“浪漫”及其衍生概念经历了独特的内涵流变和色彩转换。20世纪20年代初，党内同志以“浪漫”形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视之为幻想。国民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又频繁使用“浪漫”和“浪漫性”等概念指称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堕落腐化等习性。及至全面抗战爆发，以“浪漫”为核心的“浪漫主义”，象征着光明与希望，成为革命领袖眼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有的精神。考察上述概念群内涵流变与色彩转换的历史可以发现，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不同问题与历史任务，或许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语境中对概念进行个性化征用与差异化表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2期**

作者：车宗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的创造，深刻反映了中国的阶级状况和政权基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辅相成、相互统一。作为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决定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形式，根本领导制度和根本文化制度巩固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坚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为专政职能的发挥构筑起制度保障。

**《历史的印记：从重大工程的长期影响看区域发展》，《学术月刊》**

**2023 年第 4 期**

作者：李天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摘要：新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半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重大转型。透过“一五”计划时期诞生的 156 项工程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可以一览中国区域经济七十余年的发展道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现实特征。研究表明，通过有效提升本地经济要素集聚密度，156 项工程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相比于沿海，身处内陆的 156 项工程对于本地经济发展更加重要，并且在全国工业增长较慢时，156 项工程所在的内陆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中央转移支付，但这些城市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却有可能减弱转移支付的实际效果。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化的今天，产业投资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地理区位，区位优势地区更易于实现投资目标，而区位优势地区的低效率阻碍了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话语的嬗变：一种产权社会学的分析》，《学习与探索》**

**2023 年第 5 期**

作者：王庆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

产权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化的新劳动伦理将工人的生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结合起来，强调工人是国营企业的一分子，工人是为了自己和解放劳苦大众而劳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时代，“工人国家”的体制定位、职工“以厂为家”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工人老大哥”的政治地位强化了以工人主人翁意识为基础的产权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主要历经了放权让利、抓大放小、主辅分离、股权多元等多个阶段，与企业所有权置换并行的是企业职工的身份置换，国企职工重申“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产权话语意在依凭身份追溯就业权和福利权。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产权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达相契合，产权话语的嬗变是透视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的重要视角。

**《人民性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作者：李遇春（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要：在中国语境中，红色诗歌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引领下的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创作的具有人民性的诗歌。红色诗歌经典化是包括生产（创作）、分配与流通（传播）、消费（接受）各环节的完整的文学交往活动。从接受美学视角看，红色诗歌经典作品在接受形式上具有口传性，在接受内容上具有确定性，在接受方式上具有共享性，因此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特征。红色诗歌经典化在新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人民性与现代性两种美学话语博弈的情形。人民群众和大众型专业读者往往站在人民性立场上力挺红色诗歌并以人民性标准为其辩护，而精英型专业读者习惯于从现代性诗歌美学出发排斥或贬低红色诗歌经典。这在各种文学教科书编写、文学选本编选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但人民性与现代性之间并非互不兼容，而是既充满冲突又彼此融合。新时代需要重建具有中国式现代性的人民美学，也需要重构

红色诗歌经典化的新路径。在坚持文艺人民性的前提下，拆解左右对立、雅俗对立和新旧对立思维定式，拓宽红色诗歌经典化路径，切实处理好人民性与现代性两种诗歌美学的辩证关系。

#### 《近代中国“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考释》，《人文杂志》2023年第4期

作者：黄兴涛、岳忠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酝酿于清末，诞生于民初。此话语最早依托的成型故事之主人公多为归国留学生，却并无具体所本的人物“原型”。故事主体部分由清朝文人石成金所编《传家宝》中一则关于“北京的月亮比外地圆”的笑话加工改编而来。作为一种批判盲目崇洋媚外者的经典讽刺话语，其兴起与民初不满“西化”、强调“国性”的反思性思潮和中国留学生社会形象的变迁密切相关。在日本侵华加剧、“本位文化”运动开展和民族复兴思潮高涨时期，其得以广为流传，约在抗战胜利后达到高潮并延续至今。在近代中国总体落后于欧美日本的现实背景下，该话语常被用来提倡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批判盲目崇洋心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所反映与讽刺的那种非理性文化心态之内涵典型而复杂，成为“全盘西化”论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后者又反过来构成强化这一心理的理论导引和思想武器。该话语的实践呈多维化特点，具有丰富的自我阐释内容，有时也会被笼统、武断使用，成为文化保守者反对改革的工具。今天，它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价值。

####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先声的阶级论》，《人文杂志》2023年第4期

作者：李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艺术活动相结合的切入点，阶级论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反映社会生活、作家世界观与创

作方法、作品题材与主题、大众接受等问题上，以此兴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但同时也遭遇了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人民论及文艺人民性理论的提出，不但攻克了阶级论遇到的难题，而且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阶级论因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先声。

###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作者：杨明洪（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 人物

### 《毛泽东的另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

作者：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新近全文公开的《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外另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文写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虽文字简约，但内涵丰富，

系统记述了毛泽东本人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活动足迹，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特别是关于乡村民主自治、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推动农村大革命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观点和主张，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为群众服务的态度，对于研究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具体历程、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文中的一些关键性的论断，还为深化研究大革命失败前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留存的一系列文献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两个结合”看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作者：王亚茹（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史华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态度理性、内容丰富、视角新颖、方法多样等特点，他不仅强调“学理化”，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推动毛泽东研究走向学术化，而且强调“多元化”，通过运用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图绘出毛泽东“人物肖像”，还强调“人文化”，基于人类社会共同关切的又“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探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当然，史华慈基于特定的知识背景、学科意识、价值旨归，其研究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异域色彩”，其中不乏误读与理论局限性。因而，我们应该从“两个结合”视角出发理解和把握史华慈的相关研究。

**《关于毛泽东著作及其版本研究和考据的几点思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作者：邹卫韶（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摘要：深入研究毛泽东著作及其版本，对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特别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以及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毛泽东著作及其版本，已经成为毛泽东研究

领域探索初心使命的一个重要基点，也成为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研究和考据毛泽东著作及其版本要结合党的早期和同时期领导人的著作，要结合党的历史文献，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历史。

**《组织动员群众：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的逻辑建构（1921-1949）》，  
《湖湘论坛》2023年第1期**

作者：夏泉、康清越（暨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历经109年的苦难抗争，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起来”革命话语，广泛组织动员群众。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来”革命话语的概念意旨逐步明确和升华，覆盖面不断扩大，对国人释放了强大的号召力、动员力、感染力，促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信任桥梁。“起来”革命话语的三种语义既有主旨核心又有辅佐补充，兼具革命目的与革命成效，相辅相成，共同形塑了毛泽东“起来”革命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是“起来”作为革命话语最贴切的释义与最辉煌的成就。

**《从“亚洲联邦”到“人类一体”：李大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期探索》，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作者：杜品（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均势格局。日本乘机侵略中国的同时，鼓吹“大亚细亚主义”论调，引发中国激烈回应。李大钊在抨击“大亚细亚主义”的过程中，从个人、国家、区域国际关系和全人类等四个维度出发，思考建构“亚洲联邦”“世界联邦”及“人

类一体”等问题，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期探索。李大钊有关民族自决、国家平等、公理人道原则以及共同体的论述，具有溯源与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大钊对建立哈尔滨红色交通站的重要贡献探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作者：胡庆祝（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中东铁路曾作为红色交通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通道。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重要枢纽是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站，带来了俄国革命的影响。哈尔滨红色交通站为去往苏俄（苏联）的中共党员与青年团员提供了安全保障。哈尔滨红色交通站的建立除地缘优势外，与李大钊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大钊为哈尔滨培养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才，并多次派中共党员到哈尔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创建哈尔滨早期党组织，为哈尔滨红色交通站的建立作了人员、思想、组织方面的准备。李大钊为哈尔滨红色交通站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以〈社会进化史〉为中心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

作者：李永春（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蔡和森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基础上，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整理出版中国第一部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从家庭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进化，具体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历史，详细阐释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科学阐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不仅对教育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革命道路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以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先河。因此，《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旅法期间蔡和森革命观的形塑与表达》，《中共党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作者：侯庆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

摘要：第三国际的刊物和小册子塑造了旅法期间蔡和森的革命观，促使他认同列宁的革命学说，选择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改造中国的途径，强调建立共产党和依靠共产国际的必要性。蔡和森接受上述革命理论，还与他早年的经世热情、献身精神和践履气质相关。社会主义论战期间，蔡和森对唯物史观和革命论的阐发带有唯意志论色彩。这种解读基于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改造中国的迫切心态，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贫弱的中国何以能走俄国道路的一种答案。

**《论中共二大前后的陈独秀与孙中山》，《中共党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中共二大与统一战线政策之历史成因是一个仍有继续厘清之必要的重要议题。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中央前五届的总负责人；孙中山是创设民国的革命领袖、中国国民党唯一党魁。两人关系极为重要，却少人论及。1920 年初至 1923 年初，他们从初次相识到并行渐远，再到革命同志，两人命运起伏既受全球时局的局限，又波及近代中国的走向。中共二大前后，陈独秀、孙中山关系的巨大转变，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的重要成因。

## 理论

《传统、制度及其适应性转化——关于贯通中国革命史与中共执政史研究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萧冬连（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历史的演进是“变”与“常”的统一，“变”是断裂和转型，“常”是延续性和路径依赖。如果不把中国当代史置于整个近代甚至更久远的大背景下，许多问题都不可能讲透。本文对贯通中国革命史与中共执政史研究进行了一些思考，重点是中国革命传统和制度在中共执政时期的延续和适应性转化问题，尤其关注两个时间节点——1949年和1978年，前者是从革命到执政的转轨，后者是从“继续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转轨。

《概念形塑：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福建论坛》2023年第3期

作者：许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王建华（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摘要：“调查研究”作为中共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表述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般词汇和术语演变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成为一个关乎革命道路、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工具方法的总体性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构成了理解“调查研究”概念的核心。调查研究概念的历史就是中共革命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的意义浓缩，反映的是中共在革命复杂性中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政党自身成长的过程。

《从向下到向内：发现中共思想史的社会史结构》，《中共党史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刘亚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要：中共思想史学科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具雏形以来，形成了以领导人思想为核心，以党史分期为经、专题为纬的十字环形研究格局。尽管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以下简称“一般思想史”）研究，这一布局略显单调，但考虑到中共思想史作为执政党思想史的特殊性，结合相关学科建设初期的现实环境，这种安排大体上是合适的。

《人民范畴及其相关命题再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23 年第 4 期

作者：陈培永、豆颖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人民是一个具有建构性特质的主体范畴，它的出场激活了原初意义上的民众，使其从被统治者成为享有权力的主权者。人民范畴的建构性特质不仅在于它客观揭示了现实，而且还在于改变了现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从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动力的角度讲的，但它并不否认少数英雄人物所起的重要作用，它反对的是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决定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是说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这部剧的参演者，都在这部剧中扮演了或轻或重的角色。“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意味着人民是历史大戏幕后的主导者，人民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着、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人民是历史的见证者”是说人民既在历史之中、又可以抽身其外去关注它。“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并不否定某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在某个事件中是英雄，只有放眼整个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聚焦某个历史事件，才能把握人民作为真正英雄的出场。理解“以人民为中心”应摆脱“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念，形成“主体与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不是以权力为中心，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也不是以少数人为中心，而是以大多数人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本身包含着实现公平正义、团结合作的价值意蕴。

## ○ 图书

**王笛：《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以微观视角研究成都茶馆的一部历史学专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公共空间，如同一个“微观世界”，由此出发，我们得以重新触摸和审视一个城市的历史与记忆。茶馆是成都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地人习惯在那里打麻将、约会、看戏、读书、算命、掏耳朵，以及自由地争论大大小小的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茶馆这个微观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迁，本书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细密考察。作者以丰富的档案资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和细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细节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极佳地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也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张守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个体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

内容简介：个体及个体化是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反思和批判资本现代性的语境下把个体自由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并在继承近代社会政治哲学重视个体本位的基础上，通过强调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的基础性，把哲学史上对个体及其自由的理解转化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之自主活动和自我实现问题。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理论的价值承诺，也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主旨。本书旨在结合西方哲学史语境，从语言哲学的主谓关系视角考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个体理论，探讨一个具体的、丰满的个体如何才能“出场”的问题，目的在于揭示真实的个体如何出场的逻辑机制。

**冯天瑜：《封建》，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内容简介：本书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察入手，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新名“封建”的泛解已经约定俗成，本书试图从学理层面，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为中国古史叙事提供一个厘清概念的思路。本书在纵观古今、横亘中西日的时空坐标上对“封建”概念寻流讨源，分五大部分对此进行探讨。第一部分为古义演绎。第二部分为中外通约，考察欧洲 feudalism 概念东渐及新名“封建”在明治日本、清末中国的确立过程。第三部分为名实错位，近代一些人物把以君主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纳入“封建时代”，乃是“名实错位”。第四部分为正本清源，基于马恩经典著作的原典解读，探讨“封建”论之真正内涵。第五部分为制名指实，建议将秦至清这一时期主要时段的社会形态称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此两千余年简称“皇权时代”，以反映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本真面目，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较准确的前史表述。

**杨祥银、陈鸿超：《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4月**

内容简介：作为一种以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活生生的人”为核心对象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口述史学由于其研究（实践）主体、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用途）与传播（呈现）形式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它在当代的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与趋势。正是如此，尤其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口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引起众多相关学科的重视与关注。基于此，本书精选了近 20 年来已在国内公开发表的 41 篇与口述史学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希望以此呈现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多学科视角与趋势。具体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性别研究、民俗学、民族学、

宗教学、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学·档案学与博物馆学、体育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以及医学等等。

**尾崎秀实：《暴风雨中的中国：尾崎秀实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7月**

内容简介：尾崎秀实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他还被赋予了多重的身份，如杰出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家、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组织成员，乃至忧国忧民的民主主义志士和国际共产主义者等。1944年，年仅43岁的尾崎秀实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这更使他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反战、革命的世纪传奇。这种传奇性甚至超出了历史和思想学理层面，而在大众传播领域一再得到重述，但大众层面的叙述又始终泥沙俱下。尾崎秀实这一历史人物，尤其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真理解者，以及帝国主义批判者和亚洲民族平等联合之倡导者的形象，在纷繁复杂的传记史料和研究文献中尚未得到清晰刻画。从某种意义上讲，尾崎秀实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他生前的著作，并在20世纪剧烈变动的世界史语境下加以解读，力图从思想和学理层面开掘其卓越的中国论遗产。这是我们编选、出版这部《暴风雨中的中国》的初衷。本书篇目的编排以原作发表或写作时间为序，内容涉及抗日战争，中日关系的解决之道，如何建设亚洲社会主义圈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等，力求以编年的方式呈现这些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文字。

##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 ○ 论文

#### 中共创建与大革命

《〈马赛曲〉在近代中国的多重变奏》，《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

作者：宋逸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学衡研究院）

摘要：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不仅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象征，而且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歌曲。普法战争后，《马赛曲》最早由王韬以诗歌的形式介绍至中国，此后出现的各译本经历了由文言格律到白话诗的翻译过程。《马赛曲》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制订国歌的实践，启发了诸多爱国革命歌曲的创作。《马赛曲》蕴含的民族情感与斗争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以《马赛曲》《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革命歌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效用。

《鲁迅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作者：王建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摘要：鲁迅终生奉行“拿来主义”。他很早就着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随着文学革命运动向革命文学运动转变，他的翻译重心逐渐转向苏俄文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对苏俄文艺政策与无产阶级文学、“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等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除了“硬译”相关著作之外，鲁迅还撰写了大量的“译序”或“译后记”。这些文字及其对译著的“挑选”展现了鲁迅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

## 《〈向导〉周报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

作者：梁大伟、茹亚辉（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介绍和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宣传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为中国共产党接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准备了丰厚的思想材料；二是剖析和批驳“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错误主张，有力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对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凝聚和促进其他各阶级力量参加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共产党宣言〉三篇德文版序言最早中译本考析》，《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

作者：梁兴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26年2月27日，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第68期以“特载”的形式刊登了《共产党宣言原序三篇》，译者署名为“乐生”，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三篇德文版序言的中译本。经考证，“乐生”是时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政治生活》主编赵世炎的笔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赵世炎翻译这三篇序言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内外宣传教育，提高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北方工人运动的恢复与发展。这三篇序言的翻译底本应为英译本，底本可能来自于北京大学所藏外文书报。

**《革命文学的先声：论蒋光慈的文学翻译》，《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作者：熊辉（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蒋光慈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但学界至今无人对之加以研究。蒋光慈翻译了俄苏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论文，同时详细介绍了新俄的文学创作。其翻译在选材方面比较符合自身的文学创作理想和广大民众的文学审美需要，客观上传播了新思想，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他本人乃至现代文学叙事方式的创新和创作方向的转变。今天对蒋光慈翻译的评价既要参考鲁迅等老一辈学者的意见，但也应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去发现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庶民主义到“新政治学”——陈启修的早期活动与政治思想》，《澳门理工学报》2023年第2期**

作者：孙宏云（中山大学历史系）

摘要：在1923年赴欧考察之前，陈启修认为国家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而国家之维持，全赖弱者阶级之心理，而弱者之所以接受“强权”的统治，则因为处于生存竞争的时代，需要国家保护。因此，“国宪”应具有“庶民主义”的性质。欧洲之行后，他受苏联的“新社会科学”的影响，摒弃了自己此前频繁使用的“庶民主义”概念，改用“民治政治”，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对其内涵做了新的解释。不过，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编著的《新政治学》，更为理性地分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围绕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权力分配和均衡活动，不再片面强调政治斗争的价值。这一认识的变化很可能源自他对国民革命运动中“过激”行动的反思。

###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标准》，《福建论坛》2023年第5期

作者：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批评标准有显性、隐性两类。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批评标准，但这些标准其实已经隐含在有关文艺建设的具体论述中，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二是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革命倾向性；三是强调现实主义，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四是要求文艺表现工农大众，塑造新的形象。这些批评标准对于指导、促进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对照恩格斯“美学的和史学的”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 《“合群”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路》，《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作者：高翔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合群”这一核心概念是立足于近代中国本土语境阐释妇女运动进路的文化向度。“合群”意识的积蓄与勃发逐渐成为推动妇女解放的重要思潮，随着“合群”对象的不断调整与充实，形成了妇女运动中独特的革命实践话语与社会动员机制。晚清时期妇女解放最初从属于男性启蒙者救亡图存的诉求，继而从“自发”走向“自觉”，创办妇女报刊、组织妇女团体，形成“群言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介及实践，使得妇女运动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指向。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的结合，“姐妹情”与“阶级情”的变奏，“妇女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调适，展现了妇女地位从客体向主体身份转换的历史风貌，建构了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革命相互交织的文化图谱。

**《柯卡普〈社会主义史〉及其在中国的流传》，《江汉论坛》2023年第4期**

作者：曾成贵（黄冈师范学院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1920年10月，英国柯卡普原著、辟司增订、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由新青年社出版，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该书记载了19世纪前期至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历程，肯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塑造了生动的社会主义运动人物群像。《社会主义史》在中国大受欢迎，具有适宜的传播土壤和时代条件，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营销推荐和引导阅读。《社会主义史》的输入，发挥了帮助共产党人确立信仰、奠定初心、探索道路的积极作用。通过了解《社会主义史》，走出《社会主义史》，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也体现了该书流传中国的真正价值。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话语的构建》，《江淮论坛》2023年第2期**

作者：吴汉全（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三种途径实现了对“科学”话语的构建。一是建立“主义”与“科学”的意义关联，使“科学”在内涵上被赋予“主义”的价值意蕴；二是通过“革命”与“科学”的结合，凸显社会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彰显科学变革社会的“革命”精神；三是从科学“致用”的讨论中探索科学方法，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方法论意义。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诠释，“科学”话语在内涵上得以拓展，不仅融入变革社会的革命精神，还使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河北学刊》****2023 年第 3 期**

作者：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众擎易举：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兴建的多维考察》，《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

作者：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要：近代上海先后兴建了 200 多个各类民间慈善组织，成为促进和维护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重要力量。我们将慈善组织兴建时间与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口数量、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管理措施等进行关联，可以发现慈善组织的兴建与社会需求并不完全同步，大量难民涌入上海之时，并不是慈善组织建立的高发期；慈善组织的兴建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度高，自 19 世纪 80 年代一直到 1930 年前，上海经济总体上持续发展，

慈善组织也相应不断增加；北洋时期相对宽松的政府管理促进了慈善组织的大力兴建，1930年后上海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严格管控民间社会，则使得慈善组织的兴建大为减少。只有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管理规范但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民间兴办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热情才会高涨。

**《社会主义论战前后张东荪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合离》，《社会科学研究》  
2023年第3期**

作者：周月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既往学界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常聚焦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而张东荪另类（alternative）的个案，揭示出这一传播过程的复杂面相。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张东荪起初以为“非常可怕”，而后却对俄国式的革命推崇备至，但他很快便意识到其主义虽好，在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且需防止发生伪劳农主义，最后更进而认定即使是真劳农主义理论上亦“不良好”，前后呈现若合若离的反复。张东荪态度转变的背后有着特定的意图，与思潮升降及派系竞争不无关系。对此问题的辨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梳理五四前后张东荪的思想走向，也能推进对社会主义论战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天津社会科学》  
2023年第2期**

作者：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

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 《群众性革命运动与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初创和突破》，《湖湘论坛》

2023年第2期

作者：李根生（广州城市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谭献民（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的失败、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相继推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建党先驱着重思考创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的问题。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所提一系列开展党内政治活动的原则和方法，旨在淬炼一个“群众性的大党”。而毛泽东同志针对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则将党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突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束缚，以“着重思想建党”的方针推进党内政治生活与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相结合，由此实现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艰难转折。

###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八小时工作制主张与革命动员》，《人文杂志》

2023年第3期

作者：朱文哲、李世林（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五四运动后，国内知识界及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高扬“劳工神圣”，经由解析工人工作时间价值，开始广泛宣传八小时工作制。随着工人运动的逐步展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从争取八小时工作时间扩

展到争取周日及重要纪念日、节日的休息，其中对女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限定日趋严格，并力主男女工资待遇平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视为维护工人经济利益，塑造阶级意识的方式，推动了工人运动转向政治斗争，进而促进了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国民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则成为中国共产党试图推动革命高潮，挽救革命失败的手段。梳理中国共产党八小时工作制主张及实践，有助于理解工人动员政治中的“统一性”因素及影响深度。

《“精干化”：中共“党团”领导机制演变研究（1921—1945）》，《安徽史学》  
2023 年第 3 期

作者：江明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党团”是中共领导非党组织的重要制度设计，在革命实践中党团逐渐由临时机构变为常设组织，由党支部和上级党团共同领导变为不受二者直接领导的独立机构。党团成立范围由非党组织的机关调整为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党团成员由非党组织中的全体中共党员调整为担负领导责任的部分中共党员。党团领导机制演变中的这一“精干化”过程，展现了中共制度调适和规范党政关系的努力。

《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革命”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人文杂志》2023 年第 5 期

作者：葛静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国民革命前后，中共结合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国革命实际，将马、恩、列的经典“世界革命”理论转化为中国化的“世界革命”理论。自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共创新性地诠释了经典“世界革命”理论中“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与次序问题，为国共合作与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以“社会革命”为核心到以“民族革命”为核心，再到以“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

为双重核心的变化过程中，“世界革命”理论不仅成为了国共两党的革命指导理念，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发展进程。

### 《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史林》2023年第2期

作者：姜楠、忻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从1921年7月到1933年1月近12年间，除先后短暂迁至北京、广州、武汉外，中共中央机关曾分别于1921年7月—1922年11月、1923年2—4月、1923年7月—1927年4月、1927年10月—1933年1月在上海驻扎，驻沪总时长共计126个月左右。建党初期中共中央迁址频繁，驻留各地的时间较短；至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驻地更加稳定，驻扎时长明显增加。这一变化与中共中央组织体系的拓展和健全密切相关，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独立与成熟的奋斗历程。

### 《多维认知与多元治理：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王昉、王晓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为摆脱贫困、改善最广大群体的福祉进行了长期艰苦奋斗。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以争取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为奋斗目标，从社会制度、国际环境、生产关系等角度剖析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并结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主张通过改变国家制度、加强社会组织与提升人力资本等来改变贫困状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贫困思想与实践，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不仅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

成提供了思想源泉，也为当今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英美在华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描摹 (1921—1938)——以〈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为中心》，《人文杂志》2023年第3期**

作者：周瑞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21年至1938年《新华日报》面世前，在未与中国共产党自我主张深入认识的情况下，在华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依据各自立场构建中共形象，描摹共产党行为。大革命期间，两报迷惑于“布尔什维克”所指，混淆国共两党。大革命失败后，扎根农村的红军成为外报重点关注对象，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被描述成“罗宾汉”式的神秘救世主。抗战爆发后，外报又逐渐呈现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有序、敢于担当的政党如何崛起。尽管英美在华报刊以他者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部分事实，但归根结底主张的是西方的理念与价值观。相关报道也曾受到国民党宣传干预，因此应对其中所含评价与材料持有审慎的态度。

**《再论广州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发源地》，《学术研究》2023年第5期**

作者：莫岳云（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中共三大召开前的远东会议、广州会议、中共二大、西湖特别会议，不同程度地将国共合作探索推进了一步。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统战政策，但并未解决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统一战线并未发端。广州有国共合作得天独厚的条件，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中共三大成功解决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非常纠结”的难题，正式作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决策。国民党改组大会在广州召开，解决了国共合作亟待解决的共

同纲领和组织形式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由此发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发源地是广州而不是上海。

### 《中共三大：在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中把握历史主动》，《学术研究》

2023年第5期

作者：郭海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勇田（行政学院）

摘要：历史上，中共三大通过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把握了历史主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寄予的厚望与作为革命中心的广州为中共三大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提供了历史舞台，是中共三大召开的历史背景。中共三大前后党的主动作为，从实践上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中共三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思想升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从理论上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

### 《权力格局与中共安源工运的起伏》，《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

作者：王淼华（萍乡学院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民国初期的安源已形成以萍乡煤矿为主，地方军政绅商等势力共存的权力格局。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根据现实环境实行灵活的革命策略，与地方势力保持较好的关系，同时在劳资斗争中进行必要妥协以维持劳资关系不破裂，又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安源工运得以走向兴盛。1923年“二七”惨案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内部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产生论争。刘少奇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坚持劳资合作以求共存的策略，俱乐部得以取得新的发展。1925年3月，俱乐部主任陆沉未能坚持之前的策略，不顾实际，采取停运煤焦的手段向萍乡煤矿索取欠薪，结果欠薪问题未能解决，反而造成汉冶萍公司的生产链断裂，其生产始终无法恢复至正常水平，劳资关系最终破裂。9月，在汉冶萍公司与军阀的联合镇压下，安源工运最终失败。

《20 世纪上半期的地权变更与阶层流动——以浙江新登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23 年第 6 期

作者：董建波（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20 世纪上半期，地权变更造成土地所有权在业户之间的频繁转移。受分家析产及土地继承关系的制约，地权配置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延续性，而比重较高的公堂土地因其配置不均，也对地权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土地产权既没有向富农阶层单向集中，导致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也未明显转向中农阶层，引发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中农化”。相反，土地产权整体上向贫农阶层倾斜，但由于贫农户数及比重增加，浙江新登社会阶层结构出现“贫农化”趋势。同时，由于户均土地面积下降，贫农阶层趋于“穷困化”。

《甘肃省民勤县“移丘户”问题与近代国家水利现代化》，《二十一世纪》2023 年 4 月号总第 196 期

作者：潘威（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刘其恩（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摘要：在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边缘人群”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视，边缘人群与区域主流社会形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实际是国家制度与权力运作的结果，如果国家权威性减弱，就会出现国家力量在区域社会中的缺位，往往导致边缘人群试图破坏既有秩序以摆脱自身的边缘地位，引起区域社会的长期动荡。本文从甘肃省民勤县“移丘户”这一边缘人群的视角审视二十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地区的水利现代化进程。民勤“移丘户”世代被清政府贴上身份标签，在当地无权开渠引水，灌溉次序排在全县末尾。清王朝解体之后，他们开始试图破除自己在水利秩序中的边缘地位。1930 年代随着河西地区气候暖干化，“移丘户”对体制的冲击愈演愈烈。国民政府直接管理河西地区农田水利后，“移丘户”与普通民众的争水械斗成为民勤水利现代化转型的最主要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移丘户”身份问题才真正解决，实现了民勤农户的水利权力平等及现代灌溉区建设。本文试图由此展现国家存在与缺位两种情形下，区域人群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产生何种变化。

## 土地革命

《从“党团联合”到“党团博弈”：中共陕西暴动局面的生成（1927—1928）》，《史林》2023年2月

作者：梁晨晖（安徽大学历史学院）、黄文治（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

摘要：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陕西中共党团组织 and 地方革命精英在中共中央反“机会主义”和暴动指示以及团中央“先锋主义”倾向影响下，策动领导了诸如清涧暴动、旬邑暴动、渭华暴动等一系列暴动实践，充分体现出外部政策与在地既存因素结合下的陕西革命面相。此外，党团关系的调适是贯穿陕西暴动期间的一条核心脉络，陕西暴动中党团关系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陕西党团初创时期的相对稳定，到革命转型时期的党团“博弈”，再到暴动政略调整后党团一元化领导的正式确立，其间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与“试错”状态。中共陕西暴动局面正是在这一党团关系调试过程中生成，为日后中共开启武装斗争和武装割据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重要节点上所具备的自我纠错能力与“自我革命”精神。

《从“工”字银元到边币：红色货币的崛起及对新时代经济安全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6期

作者：李婧、姜雪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从井冈山根据地造币厂到陕甘宁边区银行，红色货币的创立

和发展在红军冲破封锁、保障全面经济安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地经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发展的摇篮和保护人民利益的战斗堡垒。虽然中国当前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现代经济体系，但中国共产党通过创立红色银行和发行红色货币实现经济拓荒的斗争史及其经验仍然对中国应对经济安全威胁有参考意义。文章以历史逻辑为主线，阐述红色货币的创立和演进过程，并借用内外部均衡理论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经济困难及其解决方案，提出应以底线思维、开放思维和全方位思维应对新时代经济安全的威胁。具体来说，要在新环境下守住“油和米”的底线，保障基础安全；稳定货币内外价值，提高政府信誉；实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提高人民币服务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能力；在对外关系上，在已有合作的基础上精耕细作，积极开拓潜在合作领域。

**《建军井冈山——毛泽东与秋收起义军的历史渊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才能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探索出复兴革命之路呢？在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发动的三大起义中，唯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计划落空被迫引兵井冈山后，成功闯出一条新路——井冈山道路。其中关键是要在农村环境中造就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文人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凭借自身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系统深入的认识，凭借自身在革命生涯中与安源矿工、与湘鄂赣三省农军、与叶挺独立团及其扩充发展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等形成的历史渊源关系，凭借自身勇于实践、勤于思考和坚韧不拔的品格作风，乘风破浪，缔造了一支坚不可

摧的人民军队，进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

作者：徐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1928—1930年红四军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转战赣南、闽西等地打游击，再到建立中央苏区，其军事行动背后包含了清晰的经济逻辑。首先，兵源与财源作为红军发展军事力量的两个必要条件常常难以兼顾，二者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红四军在各地的攻防转换。其次，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对红四军的行军动向影响明显，寻找财源和恢复根据地与外部的贸易交通是红军军事行动的重要考量。再次，红四军对经济问题的考量也影响到其战略战术选择，其波浪式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即明显受此影响。总之，毛泽东等人着眼于中国本土社会经济结构，创造性地将特定经济逻辑运用于红四军军事行动中，实现了苏维埃革命的中国化。

**《革命与圣火：女工夜校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劳工教育》，《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2期**

作者：冯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1928年前后，以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为首要目的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建立了以产业女工为学生主体的夜校。这些建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夜校培养了抗战时期女工运动的领袖、积极分子以及工农兵革命文化宣传的工作者。夜校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此时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由青年会劳工干事和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夜校教师通过讲、唱、听、演、看等形式关注和改造女工的主体经历，激发女工的自觉乃至阶级意识。女工夜校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文化民主统一

战线的出现，也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 抗日战争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两个早期中译本的对比考略》，《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

作者：王晓真（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早期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中译本，即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吴黎平、刘云译本和1939年4月上海海潮社出版的郭和译本。这两个早期中译本虽然出版的时间相近，但两个译本在译介动因、参照底本、编译内容、翻译术语和传播范围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论持久战〉写作时间考订》，《江海学刊》2023年第1期

作者：周一平（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浪（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关于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的时间，当时的警卫员翟作军在《在毛主席身边》（《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中共旅大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学习室1977年编印）一文说是“1938年初”“初春”，其时尚在用炭火取暖。中国传统的节气“立春”，一般在每年公历2月3—5日，“初春”的时间段一般是2月上旬至3月上旬。据翟作军回忆，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按：其中因病休息了一天，应该是第十天的半夜），毛泽东把初稿交翟作军送解放社。

**《经略皖东：中共华中敌后抗战的区域探索及抉择》，《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 年第 2 期**

作者：李雷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摘要：中共虽很早就认识到皖东在华中抗战中的战略价值，但因对鄂豫皖边的特殊关注而又呈左右观望之势。武汉会战后，鉴于桂系在大别山站稳，各方才开始推动江北军政力量向皖东集中。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集中皖东的共识，是 1938 年底张云逸北上与皖省当局协商后逐渐形成的。中央层面关于江北部队向东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则延至 1939 年 4 月方始确立。稍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设立及高敬亭事件的落幕，为经营皖东奠定了基础，也确定了皖东作为“华中武装力量领导中心”之地位。刘少奇率中原局进驻皖东，虽感到皖东已失最佳时机并提出“向苏北发展”的替代方案，但在具体推进中又发现缺乏皖东的巩固，“发展苏北”也难有着力之点，转而聚力经略皖东。

**《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民兵武装研究》，《史学月刊》2023 年第 5 期**

作者：尹传政（中共山东省党校党史部）

摘要：为适应山东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从人民自卫团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民兵，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武装整训等措施，使民兵成为民众抗战的核心力量，与正规军、山东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反“扫荡”军事作战力量，还担负着发展和保护根据地农业的任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以至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民兵经过长期军事化和组织化训练，被塑造为正规军预备役和抗日基层政权的政治骨干，成为中共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政策》，《中国农史》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尚娜娜、康沛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为了达到粮税收入目标与实现公粮负担相对公平、缓和社会矛盾与维护统一战线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出台实施救国公粮政策之后，又对其不断地进行了调整与改进。纵观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政策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7—1938年，中共初步实施救国公粮政策，征收方式以政治动员、自愿报缴为主，在此过程中犯了“平均摊派”的右倾错误；1939—1940年，中共对救国公粮政策进行了初步调整，征粮重心向富户转移，这一时期出现了加征大户的“左”的倾向；1941年之后，中共深化改进救国公粮政策，开展征粮调查、引入民主评议，由此实现了累进征收与民主评议的有效结合并推动了边区各阶层人民合理负担。救国公粮政策的出台、实施与改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同时也内在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 《延安时期新哲学会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张忠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起成立新哲学会。通过主办古代哲学讲座、成立哲学小组、召开首届年会等形式，新哲学会开展了较为制度化的研讨活动。其学习活动和研究成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对中共思想、理论、学术、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 《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

作者：马建强、公坤（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大量进步人

士的抗战文化机构，是武汉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武汉抗战期间，第三厅在宣传抗战的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与斗争。从第三厅的建制发展脉络来看，其作为国民党的机构组织诞生于蒋介石加强个人军事集权、整合政工与党务的独裁统治中，天然具备为蒋介石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政治逻辑和工作宗旨。中共则立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点，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既定方针，牢牢把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聚拢大批左翼爱国人士，最终将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战斗堡垒”。

###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反“维持”斗争》，《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

作者：柴鹏辉（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文博（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部）

摘要：从1941年初开始，日伪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中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在日伪的威逼利诱之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内发生了一些“维持”现象。这对党与群众的联系造成了疏远和弱化，削弱了部分干部群众的对敌斗争意志，对根据地和党的生存空间造成严重危害。通过分析发生“维持”的原因，太行抗日根据地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项举措，明确斗争策略的适用范围和限度，切实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开展锄奸反特工作，扩充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积极进行反“维持”斗争。这些正确的举措改善了群众生活，激发了群众斗争热情，清除了日伪发动“维持”的爪牙，壮大了群众武装力量，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从而取得了反“维持”斗争的胜利。太行抗日根据地反“维持”斗争的胜利表明，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而这也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人的争取工作》，《民国档案》2023年第2期

作者：王富聪（《团结报》史学版）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城工组织在沦陷城市始终进行着秘密抗战活动，争取工人和苦力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城工组织利用根据地与沦陷城市的地理、经济和社会联系，广泛寻找城市关系，派遣干部打入工人和苦力行业，地下党能在残酷的环境中站稳脚跟，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日伪对城市和工厂严密统治下，地下党建立隐蔽精干的秘密组织，巧妙地利用合法形式，组织不定型的松散团体联盟，通过社会关系、拜把兄弟和结干姐妹等从感情上团结工友，和工人打成一片，逐步教育，发展组织，组织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其中既有增资、罢工类的“合法斗争”，也有偷、怠工、搞破坏等活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国共关系视域下中共在甘肃陇东边区的成长》，《安徽史学》2023年第2期

作者：柳德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自八路军入驻陇东，甘肃国民党地方政府即对其保持着敏感而警惕的遏制之心，且其遏制政策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甘肃地方政府的遏制并未阻断中共在陇东边区的发展，在驻陇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下，中共力量不仅由乡村延展至县城，而且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中态度坚定，在陇东问题交涉中据理力争。中共之所以能在陇东边区扎根和发展，其原因不仅在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沉暮及其行政人员的萎靡，更重要的是中共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坚定的抗战理念，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以及一大批忠诚而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农村。正是因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之间心灵相通，使得国民党地方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博弈中无所适从。

《华北抗日根据地村庄管理组织的隐性经济职能——以太行山文书为中心》，《民国档案》2023年第2期

作者：冯小红（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研究院）、刘子元（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

摘要：太行山文书所见全面抗战时期文献中包含大量田房交易契约、田房补契、物件交易契约和解纷契约，这些契约为深入研究抗日村公所和村农救会等村庄管理组织的“隐性经济职能”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通过系统研究这些契约可知，大致在1942年之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村公所和村农救会等村庄管理组织接手了监证田房交易、监管田房确权、监证物件交易、处理经济纠纷等农村日常经济事务的监管权，使这一部分公权力在阶级属性上实现了由属于地主阶级的乡绅向由贫雇农和中农组成的底层农民转移，在政治属性上实现了由属于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乡绅向开拓新政治秩序的先锋中共党员转移。抗日根据地的村庄管理组织监管农村日常经济事务，就是其“隐性经济职能”，这些职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缔造的乡村治理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中共对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社会结构的改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作者：李春峰（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在晋察冀边区村选举与村政权建设中，为乡村社会各阶级表达或隐匿其政治诉求与政治利益提供了实践舞台。中共、村干部、民众在乡村民主政治的舞台上，发挥了不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改造了村政权组织结构，削弱了地主、富农对乡村权力的影响，锻炼和培养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乡村干部队伍，促进了民众行为、思维方式的转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抗战时期报刊的地理分布、发行范围与时代特色》，《东岳论丛》

2023 年第 5 期

作者：蒋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业受到极大摧残。报刊编辑、印刷、发行受到战乱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退步。大量报刊被迫西迁，报刊地理分布发生很大改变。重庆成为战时报刊中心，西部地区报刊业发展较快。而上海、北平等大都市报刊业明显衰减，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积极创办各类报刊，尤其是各种油印报刊能深入基层官兵和乡村社会，发挥了抗战宣传的重要作用。而沦陷区报刊受到敌伪的干预，其负面影响较为明显。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总理遗教”话语的演进》，《福建论坛》2023 年第 3 期

作者：秦勤（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总理遗教”是孙中山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应时局推进团结抗日运动的思想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共两党对总理遗教的阐发各有不同，一题多表。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主张国共两党共同继承总理遗教，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奋斗。全面抗战中后期，中共在阐发总理遗教、维护国共合作关系的基础上，要求国民政府厉行民主改革，推进国内民主进程。中共对总理遗教的认同、接纳和阐发既展现出自身政治视野的宽度，也体现出为推进民族解放事业和政治民主所作的努力。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实践与现实启示》，《思想战线》  
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唐彦林（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李蒙佐（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被凝练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抗战时期把群众路线思想广泛运用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带领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三三制”原则，开展整风运动；推动文化与抗日群众相结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及成功运用也为新时代探索群众路线新的实践方式，满足新的群众利益在思想和实践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火车头”：作为基层传播媒介的冬学运动及其对妇女翻身的影响——以晋冀鲁豫根据地（1937-1948）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2期

作者：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冬学是一种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开办的季节性学校。在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时期，冬学被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广泛开展识字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活动。本文以晋冀鲁豫根据地（1937-1948）为例，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总结和分析冬学运动的组织机构、动员工作、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及其作用与意义。从基层传播的角度分析冬学运动如何内嵌于乡土社会，成为妇女教育、妇女参加生产教育、妇女革命意识教育的中介，是一种充分利用在地资源并完成社会改造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教育模式。1944年延安新教育方针发表，对冬学运动的教育模式、组织方法进行了反思，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方法，与生产、时事教育相结合的“新冬学”，使得冬学成为“一切工作的火车头”，冬学变成一种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媒介，在妇女翻身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偏远农村地区还广泛采用冬学模式进行社会教育工作，显示了根据地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新中国的延续关系。

**《抗战期间大学生政治思想转变研究: 以武汉大学学生杨静远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 年第 2 期**

作者: 刘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摘要: 自抗战后期开始, 知识群体普遍经历急剧的政治思想转变。中共得到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支持, 国民党则恰恰相反。本文依据武汉大学学生杨静远 1941 年至 1945 年的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 就这一问题进行个案分析。本文认为, 中共地下党的客观存在、战争激发出来的政治意识、青老两代之间的代际冲突, 共同推动大学生在抗战后期发生政治转向。

**《抗战时期李达与一二九师司令部建设》,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

作者: 张城林、罗玉明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李达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期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司令部建设必须适应正规化作战的指示, 开创性地提出了“三个面向”原则。依据部队作战与战争形势发展需要, 他对一二九师司令部职能机构进行了“战斗化”“精干化”“专业化”的阶段性改革, 在参谋工作人才培养方面, 采取了“业务能力为基础、军事技能为中心”的系统性策略。不仅建立健全了分工明确的司令部组织系统, 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参谋人才, 为保障军事斗争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新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以抗战募捐为中心的考察》,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

作者: 武明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全面抗战时期, 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 新疆各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掀起爱国救亡运动, 这既是他们反抗外来侵略历史传统的继承, 也是他们对和平生活的现实需要。通过社会各界广泛动员,

新疆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纵向传布得以实现，他们主要通过献金运动、募捐衣物、文化劳军、献机献马、写慰问信表达爱国思想。全面抗战时期的新疆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呈现出显著特点，即新疆各民族爱国向心力的生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文化的作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向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迈进。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新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对当前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借鉴意义。

**《鼓舞抗战建国，构建民族国家：苏联沙皇题材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1938—1949）》，《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作者：刘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电影《彼得大帝》通过上海、新疆、香港、哈尔滨四条路径传入中国，这四条路线都受政治因素影响。因1938年时值中苏蜜月，国民政府对该片鼎力支持。盛世才自哈萨克斯坦引进该片，1942年因其立场转向而封禁苏联电影。日本因诺门罕战役惨败，对租界施压，禁止放映《彼得大帝》下集，但当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又允许沦陷区小范围放映该片。中国各界在观看《彼得大帝》时，主要发掘彼得大帝领导俄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经验，以应用于中国抗战建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察冀日报〉妇女报道研究——以1941至1942年样本为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作者：孙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摘要：文章旨在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样本为从1941至1942年出版的《晋察冀日报》中整理、抽取到的全部妇女报道，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包括分别据出版时间和题材对这些报道的数量进行分类统计，就数据结果结合相关史实进行纵向的比较分析，选取典型的报道文本案例内容进行定性分析，以期较为系统地厘清1941至1942年期间在不同的战争阶

段下,《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与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发展形势之间的关系、特点与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对马克思妇女观、苏俄妇女观、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妇女观等相关理论的沿变和中俄不同历史现实案例的比较分析,诠释这一时期该报报道所体现出来的妇女观及其特点、影响、历史和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在这期间,《晋察冀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创办的代表性报纸,在反“扫荡”中坚持不懈地刊发妇女报道,体裁多样,题材聚焦于抗日反法西斯和妇女解放与发展,密切联系国内外时局变化,兼具地区、全国和国际视野,为当时以晋察冀边区妇女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群体高擎革命理想与希望的火炬,不仅为晋察冀边区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动员妇女参与抗日生产和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边区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治理道路和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卓越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塑造了反压迫、反法西斯的中国妇女报道新立场。该报这一时期的妇女报道辩证地学习和借鉴了苏俄妇女观,始终与本国国情和所处地区的现实生活生产和抗战实际相结合,是这一时期下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妇女观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实践,同时展现出当时以晋察冀边区妇女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积极进取、勤劳勇敢、顽强不屈的精神面貌。其中对于开展妇女工作和社会治理的相关理念,如何保护妇女权益、肯定妇女价值、塑造女性社会角色多重性以及以社会合作积极谋求家庭与时代共同难题的更佳解决方案等,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妇女工作以及社会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荣誉军人”特殊教育》,《南国学术》2023年第1期**

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

摘要:人类对残疾人比较正规的集中收养教育始于军人。1706年,

法国在巴黎建成“荣军院”，开残障军人教养机制之先河。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係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倡道者与监护者所爲。从比，救助伤兵成爲人类通过国际法约定的共同行爲。此时也是近代特殊教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之际，教育与养护两者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对伤残军人施行教育的理念从欧洲至亚、非、拉、美、澳传播运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官兵伤亡惨烈，救助、教养、安置伤残军人爲常务之急，对荣誉军人的特殊教育也适时发展起来。1938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荣誉军人教导院”，树起尊崇荣军的样板。平等相待，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教育公平，既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环节，又是高标准要求。而荣军特殊教育是民族战争善后工作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关系到受教人的乐生就业、心理康复、社会融入、家庭幸福、后方建设等。中国荣军特殊教育体系在抗战期间基本架构成型：各级政府从漠视到重视，制定了相应的法令法规；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边区”到“国统区”的管理和教养机构；当局颁行了荣军教育的课程准则和课目指道，包含智识教育、职业教育等类别，旨在增强其自力更生和服务国家的能力，助其儘快实现自尊、自立、自强，因而将技能教育置于重要地位；荣军特教的体系学制、教学语言、教材教具、方式方法多借鉴于欧美发达国家。军人原爲社会最强势集团中的成员，因伤成残转爲“荣誉军人”后，变成弱势，心理落差极大，而要恢复直精神“强势”，教育爲最关键环节。考察荣军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虽已取得建基立业、大致完形的空前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弊病：对伤残军人未能做到应收尽收、应养尽养，更遑论应教尽教；在教养中，重“养”而轻“教”，即使“教”也多注重职业技能训练，而非基础人文修养；政府虽出台各种优惠举措，却常常口惠而实不至，难以完全兑现。伤残军人窘况承待全面改善，荣军特殊教育尤需更大进步。这绝非战争环境下的中国所能实现。

《国共两党对战后惩奸活动的舆论引导（1944—1946年）——基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的分析》，《福建论坛》2023年第4期

作者：段振华、彭敦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抗战后期以来，如何对即将到来的惩奸活动进行舆论引导，成为国共两党共同面临的问题。概言之，《新华日报》等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性，《中央日报》代表的国民党强调法治性。两党作此选择，取决于各自的政党属性和现实条件。内容上，共产党强调的人民性在实践层面并不排斥法治因素，而国民党强调的法治性在实践层面亦有含纳人民因素，双方均提及肃清汉奸思想等共同点，但不能否定两党在舆论引导上的根本性差异。社会效果上，共产党注重对各民主势力和人民群众意见的吸收，与公众互动频繁，效果历历可见；而国民党较为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着意宣导与战后惩奸有关的司法改革等主张，反而让不满当局惩奸表现的思想倾向得以显现出来，效果明显不佳。造成这种社会评价低的根源，在于国民党舆论引导中的法治性追求与其惩奸实效的背离。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学海》2023年第3期

作者：汪小宁（西北政法大学）

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

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情理断案、调解与简约治理——以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作者：胡永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模仿西方法治的“据法审判”不同，边区有意识地探索与中国国情更为吻合的司法之路。以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例，由于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相对于边区社会来说过于超前，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始料未及的问题，边区在改进立法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司法中的变通方式。在判决中运用情理做出判决的“情理断案”，以及推广相对灵活、不拘法律条文的调解模式，即是边区在司法中进行变通的产物。“简约治理”模式符合当时精兵简政的潮流，以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持了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它既体现了边区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体现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模式的反思与改进，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法制道路的可贵尝试。

**《陕甘宁边区卫生健康治理的实践考察与历史经验》，《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23年第3期**

作者：汪小宁（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妮（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闭落后，人民的卫生健康状况极其恶劣，整个边区笼罩在各种疾病、高死亡率的阴影之中，对社会稳

定和生产建设形成巨大的冲击。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以“人财两旺”为出发点，建立健全各级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颁布相关决议和法律法规、通过多渠道的宣传工作推动民众卫生健康意识启蒙与健康观念现代化。这种自上而下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为陕甘宁边区刮来了“一阵春风”，守护了边区军民的生命安全，实现了政治权力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陕甘宁边区卫生健康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三个坚持”等宝贵历史经验，对于推动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丁玲 20 世纪 40 年代的情感改造——基于对〈三日杂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23 年第 3 期

作者：王冬梅（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枣庄学院文学院）

摘要：丁玲在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和创作进路。正是以《讲话》所要求的知识分子改造为基点，丁玲在有意识的下乡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情感机制，力求将个人的感觉结构内嵌到时代的精神结构之中，从《三日杂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体现了这一情感改造的过程。在不断地深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丁玲重建了自己与乡村世界的联结方式，并尝试着以自身的感知为中心，重塑自己的情感结构，最终完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转化。

## 解放战争

《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新乡的城市动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作者：苏全有、隋延亭（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城市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工作的重要内容。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对城市的战略争夺、中共对城市工作的探索和新乡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极端不满，是中共在新乡开展城市动员的现实诉求。在新乡城工委领导下，中共地下党员在城市贫民、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反动派等群体中开展了思想动员、关系动员、利益动员、权力动员和信任动员，以唤醒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争取和团结“最广泛”的力量，与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争取新乡的和平解放。这段历史是对中共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也为新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年）对国共两党组织体制的比较分析》，《社会》2023年第2期**

作者：解鸿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从国共两党对战后东北接收方案的比较入手，通过考察双方对区域工业遗产作出回应的具体策略及过程，揭示两党在接收中的不同组织困境以及各自的克服之策。复员和动员分别是国共两党在各自区域内的基本组织逻辑，而“条”“块”间的冲突与“统”“分”间的张力则是二者分别面对的结构困难。在美苏对抗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国民党坚守城市和铁路线，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接收要员发挥空间受限；中共虽退居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但能接续既往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并促发军政和财经干部在组织上的创新。对东北的接收方案的差异既是两党利用组织原则应对地缘政治和区域制度遗产的体现，更折射出各自建国方略上的差别。从组织体制上来说，东北的接收恰恰是中国国家建设在20世纪中叶的转折点，其所激发出的政党在组织上的创制提供了由战时走向建政的组织上的转化机制。

《全面内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勤俭建国运动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作者：潘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全面内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发起一场名为“勤俭建国”的运动，期冀这场运动在配合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财经改革的同时，成为“转移风气，改革社会”的起点，进而奠定“戡乱建国”基础。与此前各项社会运动相比，国民政府在此次运动的发起方式和设计上均试图有所改变。然而，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影响，国民政府在这场运动实际的推行中继续重蹈此前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真正动员民众参与，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运动最终随国民政府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崩溃而淡出历史舞台。

## ○ 图书

**罗志田：《激情年代：五四再认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2023年5月**

内容简介：不少人以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已无多少剩义可探寻，其实对那场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与其他地方的呼应，哪怕是活动的具体经过，其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的言与行，我们的了解都还不能说充足，更不用说广义的五四了。可以说，五四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五四，没弄清楚的具体内容都还不少。正因此，我们对五四运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书写了历史、影响了后人，仍缺乏深入的体悟，毕竟那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激情的时代，发生在当时的任何事情，多少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五四运动本身，也特别需要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激情的丰富的历史活动来理解和认识。本书是作者专注于此项研究多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最新论著。

**孙会修：《托派与近代中国：一项政治文化史的考察》，开明书店，2023年3月**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重要史实新征，更完整地呈现中国托派的组织变迁史；通过考察民主集中制在托派的实施及干部群体的新老之争，透视托派的组织文化史；通过检视托派对中共、国民政府和苏联的认知与评价，探讨阶级观念与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的映像；通过梳理1930年代托派参与的学术活动，展现托派在社会史论战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

**张永：《锻造组织：红军与苏区史新探（1927—1934）》，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3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十几年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汇总，作者在书

中尝试以“崩溃—重建”模式对 1927—1934 年间中共的军事政治运作进行探索。本书指出，革命不仅是破坏旧秩序，也是建立新秩序，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成长同时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重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起源于这个历史过程。从建党、建军到建国的政治重建道路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出口，在这一过程中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列宁主义革命党发挥了关键作用。

**赵诺：《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 年 4 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势和太行根据地的创建、坚持、发展的过程为背景的著作。围绕太行根据地干部成长活动的变迁，讨论了来源不同的党员干部的融合、党内干部队伍的整合、党内整风运动的方法方式与成果三个方面的内容，指明各种党建措施在干部培养和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本书利用档案史料、地方党史、报刊材料、老干部个人日记、口述史料等互相参证研究。设置四个章节：第一章叙述太行山根据地的简历及干部队伍框架的搭建过程。第二章叙述 1940 年前后的太行根据地第一次整党，第三章叙述 1940 年秋冬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后干部群体的政治生存状况，第四章叙述 1942 年到 1945 年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第五章叙述太行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过程中区级以上干部的整编。

**周祖文：《华北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 5 月**

内容简介：本书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征收为研究对象，通过展现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山东、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的不同面相，阐释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过程中复杂的实践形态。

吴廷俊：《〈大公报〉全史（1902—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内容简介：本书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年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入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容更为生动、丰满。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大公报》史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冯森：《近代中国大众教育的兴起（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23年5月

内容简介：以工农等非精英为主体的大众教育是20世纪中国特有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大众教育归入社会教育的范畴。然而，20世纪中国革命的路径深刻地改变了源于欧洲现代市民社会的教育理念。本书通过个案呈现大众教育在近代中国兴起的历史，聚焦三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有关工农等非精英大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他们来说，工农的教育并不仅仅是识字、算数。大众教育既是这些不同派别知识分子和政

治力量接触和认知大众的方式，也是他们改造和动员社会群体的重要场域。

**齐锡生：《分崩离析的阵营：抗战中的国民政府 1937-1945》，联经出版公司，2023 年 5 月**

内容简介：军事在 20 世纪中国政治与社会舞台中扮演了无比重要的角色，自北伐起，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已非常密切，到了对日抗战时期，彼此关系愈加紧连，战事和战局影响内政，内政质量和效率又影响战争。本书强调军政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把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后方党政军的状态和前线的战事，纳入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架构之内。由于国民党北伐的速成，重要军国大计多是谈判妥协的产物，因此清末以降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军阀对立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隐藏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假象之下。随着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些妥协的后果逐渐浮上台面，不但各地军阀对于抗战阳奉阴违，只求自保；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致使蒋介石有“一生之苦厄全在于党务也”的感叹。透过齐锡生对相关档案、日记的梳理，可以观察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内外交迫，无论是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或是地方实力派的强硬，以及国民党本身的腐化与分裂，都早有预兆，而这似乎也预示着战后中国的命运。

**马俊亚：《日军毁劫与江南地区经济衰变（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 3 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础重大项目《中国经济抗战研究（1931—1945）》丛书中的第一本。本书以日据时期京沪杭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破坏、掠夺和限制利用。由于日军的掠夺，向来被誉为鱼米之乡的

京沪杭农村，在日据期间长期处于饥荒中，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况。整个京沪杭农村的副业经济，包括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均惨遭破坏，受灾破产的农村人口之多，为历史上所未有。尤为令人痛心的是，这场侵略战争打断了京沪杭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阻断了京沪杭农村的改良建设和社会发展。

**叶建：《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内容简介：本书将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问题置于知识与社会互动的语境中加以探讨，全方位、多层次地考察了思潮（社会、政治、学术等）、媒介（报刊文章、学术著述、通俗读物）、读者（专业学者和社会大众）与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的关系问题，着重分析了近代唯物史观史家围绕着当时中西交融的史学思想资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共同体等核心问题所展开的理论探讨和话语建构，同时对社会读者想象、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式和内容等新问题也有初步的探讨，这些对于当前学界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演进的学科脉络，揭示其中的规律性特点，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

### ○ 论文

####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被遗忘的新中国电影人才摇篮——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办学历史考述》，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作者：阎方正（西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是新中国初期三所电影专业院校之一，为新中国培养了多位杰出的电影工作者。以往电影史著作对该校的书写存在明显缺失，参照近期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本文力求完整地对该校办学历史进行考察。在上海市电影局的鼎力支持下，该校建立了完善的教学设施与有序的组织系统。从学员招收、课程设置到就业模式，都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尽管该校最终与北京电影学院完成合并，但该校培养电影人才的经验依然值得当代电影教育工作者借鉴和学习。

《“翻身”之后：中共建政初期的苏州人力车工人（1949-1958）》，《二十一世纪》2023年4月号总第196期

作者：毛升（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摘要：1949年中共建政后，人力车夫被中共划入工人阶级的范畴，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中共以苏联为师，意图迅速将中国从农业国改造成为工业国，实现交通机械化，迅速取缔人力车业。人力车工人因此面临一个吊轨：在政治地位上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在经济利益上却要现代化付出代价。因政府无力提供充

足的转业机会，人力车工人为维持生计，强烈反对取缔。本文利用苏州市档案馆所收藏的档案、当地报纸和公开出版的文献，以及口述访谈，考察中共如何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终于在1958年取缔了人力车业，做到了国民政府力所不逮的事情。关于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本文将研究的时段下延至1949年以后，试图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政府在治理上的异同。同时，透过呈现苏州人力车工人在中共建政后的改造经历，探讨以解放穷人为诉求的共产革命，对城市贫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销产业发展与工业化建设之起步——以苧麻业为例》，《河北学刊》2023年第3期**

作者：李中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由革命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一五”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外汇资金缺乏制约落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起步，在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及国际封锁时局的影响下尤为明显。政府为解决这一难题，通过大力发展苧麻等劳动密集型的外销型产业，换取工业建设所需的设备和技术。这一策略的顺利实施得益于政府对外销产业的管控，在促进重工业建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苧麻等外销型产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旧公立大学接收与改造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作者：李晶（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据我国教育不平衡性的复杂特点，按照轻重缓急制定出对旧公立大学接收和改造的具体方针和步骤，开展了对旧公立大学的接收和改造工作，取得了大的成效，使得我国公立高等院校焕然一新。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旧公立大学

的接收和改造工作的基础上，阐释党对高等学校领导和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可总结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造的历史经验和有益启示：发扬革命传统，在改造中国传统教育基础上发展新中国高等教育；坚持开放包容，在学习他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新中国高等教育；立足中国国情，在总结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新中国高等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南沿海的剿匪斗争——基于渔业问题的研究》，《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

作者：叶君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49年浙江大陆解放前后，国民党武装力量纷纷逃往沿海岛屿进行抵抗。在地方档案中，这些国民党武装力量主要被称为“海匪”。浙南沿海是中共剿匪斗争的一个重要地区。海匪抢夺或毁坏渔船，抓走甚至枪杀渔民，严重破坏了渔业生产，影响渔民的生计。为此，中共采取劳武结合、编队保护、北上生产等措施。海匪既胁迫渔民购买海上通行证或提供物资，又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拉拢渔民。中共在处理一般匪属和被抓放回的渔民时采取宽大政策，并专门设立招待所、供销社进行分化瓦解。浙南沿海地区剿匪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不仅对当地的社会改造产生影响，还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社会治理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劳动理念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焦润明、洪业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政权为强化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形成尊重劳动人民的意识、养成热爱劳动的风气，就需要加强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理念书写，借以灌输并养成学生们的唯物主义劳动观。“劳动创造人”“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等命题皆为核心的书写范式。这种体现革

命史话语体系的书写范式的确立又与新中国初期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崇尚劳动光荣、突出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整体社会氛围“同频共振”，取得了极佳的社会效果。

**《新中国首次全国普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陈刚（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民主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意涵，同时也是公民有序进行政治参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首次全国普选是为迎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而进行的民主政治实践。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已有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内容不仅涉及全国和各地方开展此次普选的概况梳理，还涉及许多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对于推动新中国首次全国普选研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学界在研究史料、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

**《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工作队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

作者：黄波粼（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向乡村、厂矿、高校、机关等派驻工作队（工作团、工作组）是中国共产党惯常的一种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一直贯穿于党的革命、建设及改革各时期。土改工作队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队史链上的一个环节，它具承上启下的地位。相较于丰厚的土改研究，有关土改工作队的系统性探讨尚显薄弱，这与其在土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极不相符。目前学界对土改工作队研究大多散见于土改研究中，且呈现描述者众、分析者寡；区域史多、总体史少等状况；在未来的研究中，亟需明晰并提炼“问题意识”、利用多元史料相互佐证、不断拓展新的学术增长点等。总之，

关于土改工作队研究，尚有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进一步推进及日趋深化。

**《姚雪垠与大夏大学（1949—1951）》，《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1期**

作者：江明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著名作家姚雪垠曾于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在大夏大学任教。这一段时间，既是姚雪垠最后一段大学正式任教生涯，也是院系调整前的大夏大学的最后一段历史。此后姚雪垠下定决心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大夏大学则与其他大学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姚雪垠在大夏大学期间先后担任文学院教授、代理院长、副教务长、社会教育系主任等职务。

**《文学史定位与〈王贵与李香香〉的经典化历程》，《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1期**

作者：李沛霖（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要：在1942年解放区诗歌创作掀起的“民歌体”热潮中，后起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出场”的频率较高。文学史著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密集呈现，使之已然成为了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代表之作。本文从诗歌接受视域出发，以三个阶段中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为研究入口，爬梳了《王贵与李香香》在文学史著中的出场情况，勾勒文学史著对于《王贵与李香香》之经典身份给予认同与定位的历程，考察《王贵与李香香》得以逐渐经典化的情形和状况。

**《福建农村扫盲运动考察（1949-1966）》，《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孟强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贾沛韬（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在 1949 年至 1966 年的农村扫盲运动中，福建通过举办冬学和推广“速成识字法”塑造农民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凸显严肃的社会主义议题，并结构性地发明出农民的识字需求；通过“大跃进”及其后的扫盲工作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在此过程中，若干具体措施的实行使得社会主义进入农民日常生活。这一系列革命性实践诠释出社会主义的诸多意涵，促使农民对其形成政治认同，展现了一幅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丰富历史图景。

**《20 世纪 50 年代初广州驱逐港币运动中的宣传动员》，《学海》2023 年第 3 期**

作者：黄利新、王盛（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使人民币占领市场，广州市开展了一场为期一年多的“驱逐港币”的宣传动员，这背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成熟的宣传动员机制：立体式高度覆盖的宣传网络，符合群众心理的宣传内容以及战役型集中突击式宣传动员模式。这种宣传机制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彰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现代型政党独特优势。

**《资源集聚与城市再造——156 项工程建设时期上海与洛阳的共振》，《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作者：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 156 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为了平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发挥原料产地和地理交通优势，并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156 项工程基本没有在沿海工业重镇设点，而是将主要项目放在了西北、西南和东北等内陆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工业城市给予大力支持，为内陆城市提供所需的产业和人力资源，也由此实现了城市“再造”。通过对上海

和工业建设重镇洛阳之间资源横向转移的研究可以看到，尽管 156 项工程没有落户上海，但上海在重点工程和工业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时时处于“在场”状态，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特征。对 156 项工程建设期间资源横向转移的机制效果进行总结，将为我们进一步阐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提供基本经验和启示。

**《上海私营体育场馆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张屹（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申亮（上海大学体育学院）、于明星（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55 年开始的上海私营体育场馆改造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体育和建设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一次实践探索。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市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对私营体育场馆的状况进行了初步研判，接着又对其进行了整顿与再调研，为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础。随着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至 1956 年底，上海私营体育场馆的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初步建立起以“公私合营”为基本形式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单位。这一改造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新时代的群众体育发展提供了启示。

**《足尖上的“亮相”：20 世纪革命芭蕾中的女性人物塑造》，《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3 年第 1 期**

作者：张晴滢（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摘要：20 世纪中国演剧体系脱胎于载歌载舞的旧剧，具有天然的“舞台假定性”，其在舞剧作品中主要体现在“高于生活”的“亮相”体系中。演出史上的花旦“踩跷”和芭蕾“立足”具有类似的体态和不同的文化象征。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集体将二者放入主角动态的“亮相”之中，让无产阶级女性英雄挺立于足尖之上，将旧戏的四功五法、芭蕾的体态

和军事操练形体统一于流动的舞蹈动作之中。红色芭蕾的“亮相”创造出 20 世纪舞台上的革命经典，其对“至善至美”的追求曾走向打破了行当、流派、艺术门类等等壁垒的“新”人戏剧。本文尝试用一种以古证今、礼失求野的视角，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方法，回顾 20 世纪的红色芭蕾如何借助身心革命普及“红色跷功”、创造新人。

《1949—1978 年白洋淀地区人水关系的重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张慧芝（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京津冀文化融合与创新中心）

摘要：1949—1978 年间，白洋淀地区气候大致以 1965 年为起点由多雨趋向干旱，人类活动叠加其上加剧了水环境变迁。其间人水互动可分为 3 个阶段：1949—1957 年间，社会主义集体力量在抗灾自救中得到群众认同，人水关系走出传统观念的束缚；1958—1965 年间，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 1963 年 8 月大洪水中进一步发挥，但是“大跃进”也使淀区水环境发生质变；1966—1978 年间，工业污染、连续干淀，人水关系开始探索如何向工业化转型。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与工农群众结合，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工作方法，探索构建了人水互动的社会主义模式。运动式、急于求成是期间最大的不足。

##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20 世纪 50 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再评价》，《河北学刊》，2023 年第 2 期

作者：李圣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在当下学术史评价中仍问题重重。“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不仅与此前系列文艺批判运动截然不同，而且在政策制度保障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论辩空间，进而在对革命话语的弹性突破中形成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美学话语。除推动美学知识普及和美学人才培养外，“美学大讨论”还奠定了中国美学学科范式的雏形，实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并催生出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并影响至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及苏联美学话语的前置影响，“美学大讨论”又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丰富多元的方法论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还在“主客二分”的古典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兜圈打转，既脱离了国际美学的发展潮流，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脱节。“知识话语”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求的矛盾冲突，是理解这桩美学史案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功过是非的关键线索。

**《在史诗化追求中形塑现代英雄人格精神——长篇小说〈红日〉再解读》，《东岳论丛》2023年第4期**

作者：陈夫龙（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红日》以宏大叙事的史诗化追求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独异于当代文坛，不仅熔铸着作家吴强的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而且体现了他高远的价值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红日”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照耀着沂蒙大地，不断丰富着既具传统文化底蕴又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沂蒙精神，日益充实着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基因图谱的建构。《红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以宏大叙事结构再现了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辗转千里、驰骋疆场的征战过程，还在于它形塑了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使小说成为以英雄为核心形象的一曲英雄主义颂歌。

《1950年代末“全党办报”面向地方的体制建设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作者：钱婕（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1958年毛泽东致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的信，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专门就新闻工作发表的指示信。指示信发表后，关于“全党办报”的讨论继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新的热潮。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全党办报”的体制设计进一步向地方下沉，强化省级及以下各级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并建立起以各级党委通讯组为核心的集体通讯队伍。地方党报的体制建设及报刊“组织”作用的强化，与党借“调动地方”与“动员群众”实现经济建设目标的工作方法高度契合，是典型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保障和实现其效率的前提。

《反瞒产运动群众性之研究——以广西百色地区为例》，《二十一世纪》2023年4月号总第196期

作者：王力坚（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摘要：本文着眼于中共群众运动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上，以广西百色地区反瞒产运动为个案分析，深入探讨中共运动史的“群众性”议题从理论到实践操作的重要性，以及其效果、意义与影响。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广西百色地区在坚持中共领导、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反瞒产运动。当局通过各种会议贯穿始终，结合其他运动以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群众斗争形式的操作，主导、支配与操控了运动的群众性。群众运动的激化表现，则呈现为从当局针对富裕中农的斗争，发展的“国家 vs. 农民”的全面性争夺粮食的“战斗”，从而造成反瞒产运动的惨烈结果。从百色地区反瞒产运动可见，“群众运动”已然蜕变为“运动群众”。当局与群众的关系，已然由理论上利益一致的共同体，演变为现实中利益冲突的对立面。

《集体制与家户生产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生产实践的再考察》，《社会》

2023 年第 3 期

作者：颜燕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通过安溪一个产茶村落的个案，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实践及其产业后果进行了再考察。集体化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取消了家族组织，但家族组织的逻辑在实际的生产组织即生产队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尤其是生产队长居于“公家”与“小家”之间的平衡角色延续了传统家族权威的行动伦理。在生产队长“家长式”的生产决策及以家户为基础的产销安排下，集体生产突破了产销技艺在核心家族内传承的方式，转而扩散到村庄内绝大多数家庭，最终有利于分田到户后的家庭产业和地方茶叶经济的发展。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23 年第 2 期

作者：聂励（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作为一项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慎重选择邀请对象，精心设置参访议程，并周密细致地做好保障。在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批港澳同胞受邀参加观礼活动、考察祖国各地建设成就、与内地人民座谈交流等，圆满地完成了参访行程。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取得了显著成效。观光团的港澳同胞不仅增进了自身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了解和认知，而且向港澳社会积极传递祖国真实的情况，为凝聚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时期农村代购代销店问题探析》，《中共党史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张学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摘要：农村代购代销店是基层供销合作社的代办网点，也是“依靠群众办商业”的组织形式。它肇端于20世纪50年代基层商业网点下伸以及对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商业体制等因素影响下逐步发展，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两个高峰期，最终遍及全国乡村。透过农村代购代销店的发展历程、运作形态、实践作用和突出问题，可以窥见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经济的结构矛盾、来自基层的经济利益诉求，以及农村特殊的社会文化和管理资源约束。

**《建筑形态与精神符号：三线建设初期“干打垒”研究（1964-1966）》，  
《史林》2023年第2期**

作者：李德英、朱领（四川大学历史文华学院）

摘要：中共中央在决策三线建设时确立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基本原则，要求在非生产性的建设方面学习大庆精神，因陋就简，兴建“干打垒”，降低成本，将更多资金和材料投入生产领域。攀枝花工业基地是较早修筑“干打垒”的三线地区，而四川广安华光仪器厂因在“干打垒”试验中取得成功并形成经验，被上级机关树立为典型，加以推广。初到三线地区时，建设者们对推广“干打垒”并不积极。在经历一系列政治动员和思想工作后，他们逐渐接受并参与修建“干打垒”。“干打垒”因其自身优点有效缓解了基建压力，各地因地制宜的实践则促进了“干打垒”建筑形式的多样化。推广“干打垒”的过程也是践行“干打垒”精神的过程，“干打垒”不仅是一种建筑形态，它同延安窑洞一样，演变成特定时代具有多重意义的精神符号。

**《“三五”时期区域发展隔绝下的央地财政关系》，《中共党史研究》  
2023年第2期**

作者：王丹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摘要：本文尝试以地方政府的上解支出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补

助为切入点，探讨“三五”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总额分成”体制下央地共享财政收入的分配呈现出向地方倾斜的特征，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中央工业布局、区域布局战略的顶层设计对财政收入分配及央地财政关系的直接影响。对于“战备”的强调以及三线建设的启动使中央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具有集中倾向，但在财政收入方面反而由于地方上解义务的不断下调而呈现分权趋势，这也为后来中央政府的财力不足与财政体制改革埋下伏笔。

**《左翼文化的跨区域传播：1960年代星港两地的“刘三姐”热》，《二十一世纪》2023年6月号总第197期**

作者：徐兰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拍摄、乔羽编剧、苏里执导的电影《刘三姐》（1960）在新加坡掀起一股热潮。它连续在影院上映超过7个月，打破了新加坡当时所有票房记录。电影关注下层民众生活，其中优美的民歌（山歌）和美景尤其为华人观众所欣赏和喜欢。通过聚焦《刘三姐》以及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氏兄弟）发行的两部改编版本，即罗臻的《山歌恋》（1964）和袁秋枫的《山歌姻缘》（1964），本文将集中探讨《刘三姐》现象于1960年代在海外华人社群的广泛传播和接受。

**《同频共振：三线建设与乡村医疗卫生文化发展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地区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作者：陈君锋、崔一楠（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三线建设时期，在“靠山、隐蔽、分散”原则的指引下，大量的工矿企业扎根在乡村地区开展建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三线企业内部的医疗卫生文化资源产生了外溢效应，对企业所在地的医疗卫生文化事业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得益于三线企业医疗卫生文化力量的

“嵌入式”助推，乡村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医疗卫生水平逐步提高，科技人才队伍有所壮大，医疗卫生环境得到改善，乡村民众的医疗卫生文化知识日益丰富，生活卫生习惯得到了很大改善。“厂地”双方同频共振，推动了乡村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乡村民众保持身心健康，实现工农互惠提供了重要保障。

### 《三线建设与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刍议》，《学术界》2023年第4期

作者：吕建昌（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摘要：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备战为目的的工业建设运动，保护与利用三线建设留下的工业遗产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三线工业遗产系三线建设而生成，三线建设的终止时间也是界定三线工业遗产的时间下限。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阶段，部分陷入发展困境的三线企业在国家补贴资金的帮助下完成脱险搬迁，三线调迁结束才是三线建设的最后落幕。三线建设时期，三线地区存在着各种企业状况，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目标下投资建设的大中型三线企业与三线地方自发建设、自我发展的中小型企业具有不同属性与类型，其工业遗产的价值内涵也存在差异。通过提出广义三线建设企业与狭义三线建设企业的概念，可以为正确评价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内涵提供理论依据。

### 《国外小三线建设研究述评》，《学术界》2023年第4期

作者：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张胜（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备战为中心开展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两个组成部分，对新中国国防、工业、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学术界对小三线建设的早期研究多内嵌于宏观三线建设研究中，近年来则有明显进展。这些研究呈现出多面特征，对其加以总结将丰富学界关于三线建设乃至新中国史的研究视野和理解维度。

## ○ 图书

**黄昊：《1949年山东干部南下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4月**

内容简介：1949年华北干部南下，是中共中央为解放全中国，完成对南方的接管与建设事业所做的重大决策，是新中国奠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通过深入挖掘山东各地档案馆之一手档案史料，充分运用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方法，对山东干部南下组织工作进行系统论述，完成呈现南下干部选调标准、调动原则、选调方式、步骤等内容，并从社会史角度真实地还原干部南调时所表现的各种复杂思想与行动，干部南调所带来的对山东本地日常工作的考验，山东老区社会心态的变化，山东老区婚姻、家庭、人口等问题，以及山东军民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艰苦努力。本书将社会史与革命史相结合，赋予革命史更丰富的生命力，在求真的基础上，为南下与南下精神注入更丰富的内涵。

**金冲及：《经历：金冲及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3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金冲及先生的自述，呈现了先生丰富多彩的一生。书中第一部分讲述了他早年求学、接受新思想、在复旦工作和初步接触学术研究等方面经历的人与事。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为他毕生的学术志向、思想立场和行事风格打下了基础。他离开复旦大学后，先后出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物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多个重要岗位。在书中，他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以严谨的学术思考，通过回忆具体的人和事，呈现这几段不平凡的人生历程。阅读此书，可以从先生90来年的人生历程中感受大历史下的小细节、历史的变迁规律、坚定志向和个人努力的作用。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3月**

内容简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即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史。金耀基教授的《从传统到现代》作为第一本以中文书写、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规范阐述中国现代化进程与转型的学术著作，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首次问世以来，引起学界与社会广泛响应，其影响持续至今。在金教授八八载之际，此书以新面貌再次问世，除保留《从传统到现代》原著，还新增了金教授在其后近三十载关于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的多篇论文，其探索由中国现代化转向现代性，由中国现代化到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论述更深更广。透过本书，纵览金教授毕生学术研究之精华，更知其对“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文明构建”这一主题的关注之深重、视野之前瞻。

**耿强：《信仰与技术：中国社会主义翻译话语的想象与重构（1949-1966）》，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内容简介：本书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时间里，中国翻译话语的内涵与特征，明确提出十七年时期中国翻译话语的政治/审美一体化特征，对它的话语生成机制进行深入探索。本书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翻译话语体系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特征，这一话语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国语境下翻译实践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设的价值和功能。本书对拓宽中国当代翻译理论话语范围，建构一个立体多元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魏美玲：《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内容简介：《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书写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舞的发展史。从戴爱莲开创中国舞到中国早期舞蹈创作，从中国舞的黄金时代到融会了现代舞蹈语汇的创新舞剧《丝路

花雨》, 作者利用大量的影像资料、扎实的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手法, 细致记录了中国舞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兴起、成熟与发展壮大。本书也体现了中国舞从业者坚持把研究和创新作为舞蹈形式的重要建设过程, 使这一舞种既灵活多变又与时俱进的精神。

## 改革开放史

### ○ 论文

《上海小三线污染治理研究》，《学术界》2023年第4期

作者：鲁小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摘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环境保护也被要求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上海小三线在给皖南地区带来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上海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小三线企业中通过制定污染治理规划及政策、自上而下设立环保部门、加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改造、大搞综合利用、缴纳行政罚款和经济赔偿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环境污染、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但最终并未达到国家要求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甚至“两头落空”。究其原因是管理机构权责不统一、专业从事环保工作人员不足和环保专项资金投入不够。

《新时期（1978—1984）香港文艺期刊中的内地与港台文学互动——以〈开卷〉〈海洋文艺〉〈八方〉为考察对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4期

作者：陈庆妃（华侨大学文学院）

摘要：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冷战融冰，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内地进入新时期，文艺界逐渐复苏，台港以及海外华人文化圈也相应发生重要变化，香港文艺期刊成为见证这一历史过程中华人世界互动、华人心灵骚动的重要文本与文化中介。本文以《开卷》《海洋文艺》《八方》作为研究对象，返归历史场域，辨析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香港文艺期刊对内地新时期文学创作、文艺思潮的转介与回应方式，一方面反思所谓

香港文学“建构论”，另一方面也重审海外华文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若干盲点。

**《安徽小三线企业调迁刍议——以企业与城市互动为中心》，《安徽史学》  
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张胜（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86 年前后，安徽根据国家政策，立足省情，决定将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调迁至城市。小三线布局弊病、城市若干优势、邻近地区三线调迁推动了安徽调迁决策形成。企业与城市双向选择受双方利益、职工籍贯、关系网络交织影响。调迁初期，大部分小三线企业力争以迁并路径搬迁至城市，实践中，拟合并双方企业利益平衡及小三线企业优势因素决定了迁并能否付诸实施。调迁中，小三线企业困难重重，接收城市在政策、组织、资金方面给予其帮助并推动省级层面优惠政策出台，这对安徽小三线调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肥西县委包产到户政策放宽时间考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 年  
第 3 期**

作者：李嘉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安徽省肥西县是中国农村改革重要的先行县，其相关实践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1979 年 2 月，安徽省委就决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试验包产到户，1980 年 5 月，邓小平即以肥西为例，肯定农村政策放宽“效果很好”。迄今为止，对肥西县委有关包产到户的态度和行动尚无较详细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材料梳理分析发现：省委许可包产到户试验前，肥西县委于 1978 年底决定包产到户只搞一季。省委在山南公社开展试验后，包产到户在全县迅速发展，肥西县委尝试“重新组织起来”，推广“三定一奖”。1979 年 8 月，肥西县委又希望以“大包干”代替包产到户。1979 年 12 月，肥西县委放宽政策。1980 年 1 月，

全县约九成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肥西县委的政策选择，是农村改革在破冰时期砥砺前行的经典例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分配制度功能认识和政策选择的转变及其实践效应》，《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2月**

作者：丁建定、谌基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养老服务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分配制度功能的认识从强调提升经济效率转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而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强调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与此同时，中国分配制度的政策选择也从经济效率导向转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导向，进而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和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导向。在上述认识与政策取向转变的过程中，分配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实践效应得以彰显。但是，分配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依然任重道远。

**《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实践——基于对太仓与晋江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

作者：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现代化虽然曾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领跑作用，但总体存在滞后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基于对百强县市前十的两个县级市——江苏省太仓市和福建省晋江市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本文探讨了地方性在四个维度上助推县域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地方性的四个维度不但各自具有与县域现代化的适配性，而且相互适配、相互形塑，进一步提升了地方性适配现代化的水平。这背后的关键机制是由地方性滋养出来的社会文化主体性成为推动县域现代化发展和变迁的主导力量。从地方性中寻找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培育可能，

是中国更多县域推动现代化建设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江汉论坛》2023年第5期**

作者：马敏（华中师范大学）

摘要：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意义，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已作了高度概括和论述，理论界、学术界的任务应当是从实践、理论、民族和时代特色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自有其历史来源和自身演化逻辑，需按照历史发展经纬对之进行梳理，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及意义的认识。

**《现代化中的“中国式”——基于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的思考》，《江汉论坛》2023年第5期**

作者：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度的理论建构，它可以被解构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在内的多层面的发展，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工业化则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因此，以工业化为切入点来观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维度。现代化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波及全球的一场伟大实践，其起点可以追溯到英国工业革命，其源头还可以远溯至16世纪中、晚期西欧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

**《三线企业的技术引进与外资利用——以长城机床铸造厂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作者：袁世超（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

摘要：“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是事关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成功的关键。宁夏三线企业长城机床铸造厂历经扩大企业自主权、技术引进与外资利用三个阶段，从一家计划经济体制下连年亏损的工厂逐渐成长为世界一流的机床铸造商。这一案例证明，改革开放是三线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该厂辩证看待区位优势、用好三线建设提供的技术与人力资源支持、保持企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等经验对于我们反思三线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具有重要价值。

《“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作者：李茂民（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摘要：“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古今比较视域下近四十多年中国改革之特点》，《思想战线》2023年第3期

作者：杜艳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改革。而近四十多年的改革不仅标识时代特征，而且以承载重大转折、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特质让历史闪光。与历史上的改革对比不难发现：近四十多

年改革正确处理传统与革新的关系；保持改革力度与现实条件相适应；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把握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从而超越了中国历史上断裂式的改革；近四十多年改革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自我超越。突出表现在改革与对外开放形成良好互动；通过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彻底摆脱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束缚，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古今比较的视域研究近四十多年中国改革的特点，从中可获得诸多历史启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挑战与对策》，《学术月刊》  
2023 年第 4 期**

作者：刘志彪（南京大学）

摘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基础 + 全国统一大市场 + 有为政府 + 新型分配机制 + 高水平开放”这个具体的制度框架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的框架和内涵，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如市场化改革领域界定模糊、市场分割、对内对外开放不对称等。未来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直面来自国内外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如全球产业链重组、国内市场主导格局形成、产业政策转型、收入分配调整等，并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卫生问题与 20 世纪 80 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中  
州学刊》2023 年第 4 期**

作者：雷鸣（西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

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 ○ 图书

**周大鸣等：《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2月**

内容简介：《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分为三编：珠三角的城市转型，珠三角的城市移民，移民、都市与二元社区。导论部分是周大鸣老师撰写的《中国城市的转型：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是全书的点睛文章，统揽性地分析了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与文化调试。第一编“珠三角的城市转型”共收录5篇文章，分别对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珠三角地区人口迁移数据、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政策迭代情况、珠江三角洲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乡村到城市的文化转型这五个主题进行了探讨。第二编“珠三角的城市移民”共收录4篇文章，对农民工“转工”、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珠江三角洲经营型移民的社会流动、在穗非洲导购中介商的社会网络这四个主题进行了探讨。第三编“移民、都市化与二元社区”共收录5篇文章，对移民与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移民结构与城镇社会特征、珠江三角洲的“二元社区”与社区融合、“二元社区”与都市居住空间、移民与城市活力这五个主题进行了探讨。最后一篇文章是后记，题为《身边的田野——我的珠江三角洲研究之缘》，是周大鸣教授对自己多年来田野调查的总结性文章，梳理了他与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情缘。

**梁建章：《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4月**

内容简介：顺应当今社会热点：人口问题，人口创新、人口与经济、国家创新能力、教育等问题的关系。本书将详细分析人口如何影响创新力，而科技创新能力又将决定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能力。本书的基本的框架可以用以下的模型来描述：人口数量 \* 人口质量 \* (内部流量 +

外部流量) == 创新力 == 国家竞争力 本书详细分析人口规模效应, 分析老龄化如何影响整个社会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讨论城市化对于创新的影响。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会如何影响创新力, 对吸引创新型人才会有多大优势, 通过这个框架模型, 解答中国经济现状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 提出未来针对中国的人口政策预测和建议, 其中包括教育改革的政策建议。

**张璠: 《驶向现代性: 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年2月**

内容简介: 作为现代化的物质载体, 汽车曾被誉为“改变世界的机器”, 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在当今中国, 私家车与住房更是成为“地位性商品”的代表。购买、驾驶私家车, 不仅深深改变了私家车车主的日常生活,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与之社会属性息息相关的空间建构、道德观念和身份意识。可以说, 伴随私家车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正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缩影。本书根据作者在珠三角地区为期十年的田野调查写成。通过展示受访者的成长背景、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 考察私家车“开进”日常生活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呈现了被汽车相关的事物所影响的中产阶级与当前的汽车文化互动共生的现代性场景。

## 国际社会主义史

### ○ 论文

《美国撤离部分驻韩美军决策研究 (1969—1971)》，《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作者：邓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尼克松政府撤离部分驻韩美军，是其全球缓和大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 NSSM27 文件，研究从韩国撤军的可行性。由于需要和盟友韩国磋商，加之美国军方的反对以及需要说服国会批准对韩援助，美国迟迟未就撤军问题做出决策。但随着美韩各自国内情况的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快了决策步伐，其下属项目分析智囊部为尼克松政府的最终决策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并拟订了具有决策性质的 NSDM48 文件。尽管韩国强烈反对，但它根本无法改变尼克松政府调整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心。部分驻韩美军的撤走，对 1970 年代初朝鲜半岛局势大幅度缓和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伊沙拉运动到巴特寮革命：老挝反殖民运动的转折——兼及东南亚冷战的源起》，《东南亚研究》2023 年第 1 期

作者：舒全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二战结束后的五年 (1945—1949) 是老挝反殖民运动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老挝反殖民运动经历了伊沙拉运动和巴特寮革命两个阶段。前者主导了早期的抗法斗争，但因内外交困而最终失败；后者在伊沙拉运动末期兴起，开启了反殖民运动的新模式。老挝反殖民运动从伊沙拉运动到巴特寮革命的转折反映了地区局势的冷战化趋势，塑造了战后老挝政治的框架。本文依托法国殖民档案、印支共文件和越南官方史料，

试图厘清老挝反殖民运动的兴衰转型，进而揭示困扰战后老挝政治的根源，窥探东南亚冷战的源起。

**《冷战前俄国对朝鲜半岛分裂格局的推动》，《安徽史学》2023年第2期**

作者：苗威、宋欣屿（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摘要：冷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俄国先后同日本、美国谋划分割朝鲜半岛，不同阶段的目的不尽相同。日俄战争前后，俄国企图独占朝鲜半岛；二战时期则意在维持半岛的均势格局，这对朝鲜半岛的分裂进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俄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干预与东亚剧变在时间上耦合，所以不仅直接干扰了朝鲜半岛的政治一体化，也助推了东亚权力格局的横向调整。随着西方势力在东亚的渗透，朝鲜半岛问题溢出区域范围，演变为国际问题，半岛分裂成为势之必然。

**《翻译的政治：冷战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文协翻译计划》，《世界历史》2023年第2期**

作者：黄若泽（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摘要：冷战初期，美国私人基金会以宣传美国价值观为目的，发起一系列跨国文学活动，试图影响对象国的文化。从1947年到195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移植其在美国其他地区的人文合作经验，通过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双边合作关系，赞助中国文协翻译出版一批美国作品，隐蔽地影响战后中国文化走向。这项翻译计划带有鲜明的早期文化冷战意味，但中国文协希望借此机会，为中国文学的恢复与发展寻求资源，并尝试将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这项计划并非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单方主导，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化政策的转向和中方参与者的思想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项目的最终命运。冷战局势的变化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暂时退出中国大陆地区，重新规划其全球布局。

**《核战预警：苏联托茨克军演》，《经济社会史评论》2023年第1期**

作者：张广翔、赵万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摘要：冷战初期，苏联虽然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美苏核力量依然悬殊。1953年，美国开始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大力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苏联也抓紧研制核武器。同时，苏联从1954年开始组织实战演习，训练部队使用核武器的实战能力，其中托茨克军演最为典型。演习历时一天，使用了一颗4万吨TNT当量原子弹、两枚2~4万吨TNT当量原子弹，参演部队在核打击下进行战术进攻和防御，以验证核武器在实战中的效果。托茨克军演预警了核战争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于艾滋病溯源问题的认知战》，《世界历史》2023年第2期**

作者：郑安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80年艾滋病在美国出现后，艾滋病溯源问题在冷战氛围中迅速被政治化，美苏两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认知战。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部门采取“积极措施”，以“艾滋病是美国军方制造的生物武器”为核心信息发动对美宣传和政治攻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际上的反美和恐美情绪，影响了美国及其盟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里根总统上台后，美国不断强化对苏冷战态势，专门成立了“积极措施工作组”，以应对苏联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舆论攻击。最终，苏联“新思维”政策的实施和美苏关系的改善使这场认知战走向终结。艾滋病溯源问题的政治化反映了冷战后期美苏情报战、信息战与冷战进程的互动关系，妨碍了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它的终结也表明，只有摒弃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思维，跳出意识形态的樊篱，加强国际合作才能遏止病毒蔓延的势头，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

### 《冷战时期美国的危机决策与行为规则探讨——基于对里根政府处理1983年“韩航事件”的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赵建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1983年，美国和苏联围绕“韩航事件”的互动使其发展成一场特殊的“危机”。里根政府的危机管理既体现谨慎的克制，又展示愤怒的宣传，这种在“克制”和“愤怒”之间的平衡是这场危机没有全面升级的重要原因，但仍极大增加了苏联在道义和制度层面的国际压力。在此次危机中，两国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不对等及特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双方对危机事态的判断出现差别。“韩航事件”扭转了美苏关系松动的势头，实质性地提前冻结了美苏军控谈判及其他合作的进程。在危机降级过程中，美国希望持续施压的同时，主动试探对苏“务实的重新接触”，抓住时机，提出恢复低层次合作，得到苏联有限的积极回应。美国的这一举措有助于双方在高度战略互疑的形势下维持最基本互动，不至于双边关系脱轨。此次危机管理产生的积极成果是1985年美苏日就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所签署的备忘录，以及1986年三方开通新的航空通话系统。

### 《东欧国家档案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陈弢（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

摘要：本文中的东欧国家，主要指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或称苏东阵营）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这些国家曾与中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其中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曾长期占据中国第二和第三大对外贸易国的位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欧改革经验“首先吸引国人注意”。

《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的源流与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吴国富（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经过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在 21 世纪拥有了体系较为完整的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在持续的斗争实践和组织建设中，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主义流派。察其渊源，其“毛主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革命道路有所借鉴；观其流变，其本质则是基于时代特点，自主进行思想解读和行为实践的结果，并非只是“提法”不同和道路“复制”，与“毛泽东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已然嬗变为一种独立的“主义”。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反贫困的构想及其启示》《东南学术》

2023 年第 3 期

作者：林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提出一系列关于文化反贫困的具体构想。他主张，革命政权应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培养群众改造现实世界、摆脱贫困的能力。文化反贫困是一项复杂、长远的系统性工程。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模范带头作用，帮助群众对贫困问题的客观规律形成理性认识，引领社会观念的现代转型；同时，将宣传教育工作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水平的提升过程，让劳动者在参与社会改造的各项实践中理解和认同政策纲领。列宁认为，文化反贫困要同步开展思想启蒙和政治动员，使革命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引导无产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其蕴含的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的反贫困话语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德国革命观的演变：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浙江学刊》2023  
年第2期

作者：张大卫（华东政法大学）

摘要：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标志着革命观在德国经历了一场重要演变。鉴于现实政治革命可能颠覆现存法权规范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状态”的恢复，康德拒斥革命。康德之后的黑格尔通过“正义的扩充”理论，解决了康德的“规范体系断裂”问题，从而证成了革命的可能性。但是，黑格尔认为，随着历史的终结，革命也终结了。针对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提出社会革命对市民社会革命的超越。借此，在一个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现代世界中，马克思为革命的再开启以及人类进一步的全面解放提供了辩护。

《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近代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年第6  
期

作者：段世磊（华东政法大学）

摘要：“近代”概念的日本接受史，经历过日本哲学史上的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阶段。新康德主义阶段，被视作日本马克思主义近代论的辩证法前提；马克思主义阶段，被视作社会科学的近代模型，它赋予了新康德主义的文化社会以实践主体；黑格尔主义阶段，被视作对近代的歪曲，它为日本的近代化蒙上了一层阴影，不仅实质性地决定了战后日本思想界的知识图景，而且限定了讨论的基本框架，即否定论和肯定论的两个面向。但在褫夺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力方面，两种论调实现了共谋。

《社会主义匈牙利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化》，《国外社会  
科学前沿》2023年第6期

作者：亚当·塔卡奇（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跨学科历史系）、

闫书帝（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知识界对存在主义这一“资产阶级哲学”分支产生了持久的兴趣。在匈牙利，存在主义哲学从未被纳入意识形态正统，也没有被单纯地借以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卢卡奇就开启了与存在主义的论战，但直到 60 年代，来自萨特的巨大影响才为匈牙利知识界以更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接纳和诠释存在主义打开了大门。文章系统梳理了存在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匈牙利并不断得到发展的历史过程，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匈牙利知识界对存在主义的态度转变过程中卢卡奇的影响；诠释存在主义思想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的冲突；存在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及其哲学接纳的影响；海德格尔哲学研究的兴起。

**《发展型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文化纵横》  
2023 年第 2 期**

作者：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社会主义遭遇“发展”危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更体现了这一危机的严重性与深刻性。受此冲击，否定社会主义之风甚盛，国内不少人也积极认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危机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最终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如何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运作机理及其普遍意义，成为“21 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本期姚中秋的文章做了一个可贵尝试。他基于世界历史比较视野，将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定义为“分配型社会主义”，而将中国代表的发展模式定义为“发展型社会主义”；进而敏锐地指出，发展型社会主义之要旨，是先锋队政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理论，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机制，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全面发展。相比于分配型社会主义，发展型社会主义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

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比于苏联模式，中国对发展型社会主义的发展则在于，摸索出了驾驭世界经济体系之道，并开始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在体系化斗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可以自觉地引领一些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型社会主义道路。

**《重振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

作者：维杰·普拉沙德、卢屹（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摘要：世间苦难的证据并不鲜见：全球数十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充足的食物、像样的栖身之所，更无缘享受适当的信息和文化滋养。这些事实无人可以辩驳，各国政府、联合国的机构每年都会统计。关于如何解决饥饿、苦难等种种社会痼疾的争论此起彼伏。早在前民主时代和匮乏年代就出现的旧观念阴魂不散，有的认为人的苦难乃是宿命。

**《衰落帝国的“精明无为”：克洛玛事件与20世纪中叶英国的南海政策》，《学海》2023年第3期**

作者：赵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金源（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英国作为在远东拥有重要殖民利益的国家，试图在不直接出兵争夺南海岛屿的情况下，与法国、美国等盟友联合，控制南海地区制海权，成为事实上影响南海局势的殖民列强。1956年克洛玛事件的爆发使得南海局势复杂化。为应对此事件，英国外交部经过内部讨论，决定在保留对南沙部分岛屿主权要求的前提下隐藏自身对南海地区的利益诉求，避免南海争端扩大化。克洛玛事件后英国的行动实质上是为了顺应地区局势变化而对其之前南海政策的继承与完善。至此，英国的南海政策大致定型，日后南海纷争再起之时，英国外交家基本沿袭了克洛玛事件后的处置方式。这一时期英国南海政策的调

整与完善是在冷战背景下顺应其帝国战略转型、协调远东防务政策、改善中英关系的必然抉择，这反映出在帝国霸权消解过程中英国仍努力捍卫其远东利益的战略意图。

**《探寻非洲马克思主义之源——以恩克鲁玛泛非主义向非洲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视角》，《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作者：郑祥福（浙江师范大学）、吴文炳（浙江师范大学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摘要：20世纪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源起，是与非洲反殖民运动领导人恩克鲁玛奋斗史相关联的。恩克鲁玛作为开启非洲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以及作为非洲马克思主义最初的探索者，对推动全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具有极其深远的典范作用与历史影响。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重构了现代非洲精神，带领加纳人民在非洲率先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思想上实现了向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其阶级斗争理论完成了从泛非主义向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历史转变；形成了非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与基本范式。

**《华裔之变：黄锦树的“民国经验”与马共文学书写》，《二十一世纪》2023年6月号总第197期**

作者：张斯翔（国立清华大学）

摘要：本文从“侨”之身份所引发的“华夷之变”视角切入，在民国-台湾与马华族群之于马来西亚历史的背景中，试图解读黄锦树在台、马文学场域中后移民/夷民的两属/两不属身份——黄锦树从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第三代，变成台湾新住民第一代，从一种“外国人”（对台湾而言是留台的马来西亚人）变成另一种“外国人”（对马来西亚而言是已入籍台湾的马华作家）；并从黄锦树小说的互文关系，进一步探究其马共书写的“民国经验”内涵。本文指出：“移动”作为马华文学不可回

避的历史现实，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不在马来西亚的另类混成文学底蕴。黄锦树介入民国的方式，不只带有马来西亚立场，同时也带有民国 - 台湾如何形成的历史背景，两者又是与现实生命情境相互勾连融合、建构又同时消解的华夷之变过程。华裔间在移动的风潮下早已产生边界模糊的间距，而以虚构的文本介入，让我们看到华夷间距的增加、混搭，曾经被想象建构的、被以为原有的华夷边界正逐步减退。

## ○ 图书

**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 云晓丽译: 《克里姆林宫的信件》, 天地出版社, 2023年1月**

内容简介: 借助于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往来书信, 《克里姆林宫的信件》打开了一扇窗口, 让我们得以一窥三位领导人的思想和个性。他们在二战期间只见过两次, 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书信建立的, 他们的通信构成了二战战略格局的重要部分。

**季莫费·尤里耶维奇·斯科连科杜明禹: (杜明禹, 王泽坤, 刘茗菲译): 《苏联发明史: 从1917年到1991年》,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1月**

内容简介: 本书展示了苏联自成立至解体的典型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作者的视角宏大, 有独到见解。作者认为苏联虽然没有美洲狮, 但是有西伯利亚虎, 对苏联的诸多发明和发明家充分肯定。同时, 又与西方的发明环境做对比, 反思苏联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本书不是发明通史, 而是专题案例的形式, 可读性非常强。另外, 本书的序言充满了理性的思考, 表达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本书对领导干部、科学史专业内人士, 以及广大青年学生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杜春媚: 《冷战时期的美国与东亚社会》, 秀威信息, 2023年6月**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动荡, 美国在东亚的积极布局, 对各国造成了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剧烈影响。本书收录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美国学者的十二篇论文, 针对“冷战时期的美国与东亚社会”这一重要时代命题进行深入研究, 共分三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 社会文化因素。聚焦于过去研究中所忽略的社会文化因素, 分析冷战下驻

华美军的多种面貌与困境。张维缜以 1948 年美军与青岛民众之纠葛为例，探讨美军负面印象的产生；杜春媚透过二战后被视为服务美军的中国“吉普女郎”之处境，探究性关系与反美运动和中国民族主义间的复杂关联；左承颖与杨雨青以 1946 年中共军队与美军首次发生的军事冲突“安平事件”为切入点，揭示国共两党对美军驻华的立场与态度。第二个面向：非传统政治菁英。对于非传统政治精英的个人和群体的关注。胡成以 1949 年前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转变，讨论“亲美”（pro-American）医生学者在反美主义盛行年代的作为，呈现多面、多元和复杂之历史景观；藤目由纪透过 1950 年代三位到朝鲜调查美国在韩战中暴行的中国女性代表——刘清扬、白朗、李铿——之贡献，展现冷战初期国际妇女运动不为人熟知的侧面；马建标藉由 1966 年美国参议院上 14 位美国“中国通”的证词，反思 1945 年后的冷战战略和美国国际角色的定位；孙扬通过 1970 年代多位背井离乡多年、陆续回中国访问的旅美华人学者——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等人——之眼，重新审视冷战中逐渐缓和的中美关系。第三面向：全球史与比较史。对于全球史的视野和比较史方法的运用，包含对驻台、驻日、驻韩美军和驻华苏军的不同研究。吕迅以 1957 年在台民众遭美军枪杀，凶手却被判无罪的“刘自然事件”，藉此分析驻台美军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张力通过 1972 年美国空军在台中驻地种植且持有大麻事件，呈现台美双方对管辖权的争议；莎拉·考夫纳（SarahKovner）探讨了战后美国如何变换策略以减少日本人对于美军基地的反抗，使其得以存续至今；莫妮卡·金（MonicaKim）从对朝鲜战争的战俘营和美军审讯室的考察出发，揭露美国所谓道德战争的话语和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左双文和刘杉则讨论战后苏联在急于重建的背景下，以“解放者”形象对中国东北采取掠夺政策及各种军纪问题，反映出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本书选题多元，并立足于档案资料，在当前日益紧张的东亚局势下，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性、对照性和现实性。

## 海外新论

### ○ 论文

**Care as Critique of Care: Public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and Ritual Responsivenes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54, June 2023, pp. 354 - 365.**

Stephan Feuchtwang (Affili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UK)

#### Abstract

Socialist governance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requir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oday, such state care is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public services and in the guarantee of social security. Ideally,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should foster relations of care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remain responsive to “the people.” Local self-government, relations of mutual support and ritual communities, however, reveal the deficits of state care. Much like general philosophies of care, such local ethics of care propose universal benchmarks against which social practice can be measured.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main contours of state care in the post-Mao Zedong PRC, and contrasts its findings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on public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and ritual responsiveness. Mutual help, neighbourhood communities and ritual practice, in particular, provide alternative models of care. As such, they can be extended and universalized, and offer possibilities for a critique of care.

标题：作为照护的批判的照护：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仪式的回应性

摘要：社会主义治理和人民主权需要一种国家对照护的管理。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供了这种国家照护。理想

情况下，不同级别的政府应培养地方社区的照护关系，并保持对“人民”的回应。然而，地方自治、相互支持的关系和仪式性社区显示了国家照护的不足。与一般的照护哲学相似，这种地方性的照护伦理提出了可以衡量社会实践的普遍基准。本文概述了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国家照护的主要轮廓，并与关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仪式的回应性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对比。其中，互助、邻里社区和仪式性实践提供了替代的照护模式。鉴于此，这些模式得以扩展和普及，并为照护的批判提供可能性。（标题译文来自编者，摘要译文来自作者）

**Governing Rural Poverty on Urban Streets: Guangzhou's Management of Beggars in the Reform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54, June 2023, pp. 381-395.**

Ryanne Flock (Affili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Julius-Maximilians-University, Würzburg, Germany)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discourses on panhandling intertwine with the governance of beggars on China's urban streets. It focuses on lo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Guangzhou city, led by the bureau of civil affairs along with its centres for “custody and repatriation” and “assistance stations.” The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tate regulates panhandling and engages with beggars in public spaces.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state's approach and how it has changed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it also considers the junctures at which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ise. Based on fieldwork data (2011 to 2014) and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yearbooks, academic and mass media discourses, I argue that the state's treatment of panhandlers poses a conundrum as welfare measures conflict with control. While several layers of state regulation and actors contradict each other and create grey areas of state-induced informality,

people who beg for alms are continuously criminalized and excluded from public space.

标题：治理城市街道上的农村贫困问题：改革时期广州对乞丐的管理

摘要：本研究调查了有关乞讨的话语如何与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管理互动，研究重点在于广州市的地方政策以及其执行部门：如民政局、“收容遣送”所和“救助站”。论文提问这些机构是如何规范乞讨行为，并与公共空间里的乞丐打交道？管理方法的内部逻辑是什么？这些方法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是如何变化的？矛盾和冲突出现在哪里？基于实地调查数据（2011 年至 2014 年）和对政府文件、年鉴、学术和大众媒体话语的分析，本研究调查显示：国家对乞讨者的处理正面对福利与控制相对立的难题，国家法规和行动者在不同层面上出现相互矛盾，国家政策引致的非正规性更创造出灰色地带，以致乞讨者不断被视作犯罪并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标题译文来自编者，摘要译文来自作者）

**When Beijing Chose Seoul over Pyongyang: China – South Korea Diplomatic Normalization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First View,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May 2023, pp. 1-17.**

Daekwon Son (Affiliation: Sogang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Abstract

On 24 August 1992, China finally normalized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 notwithstanding North Korea's protestations. What made Beijing jettison its traditional friendship with Pyongyang and recognize Seoul? What did China want from Sino-South Korea normalization? By extensively unearthing hitherto unknown archival evid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was China's security concern about being besieged by pro-Soviet powers, rather than an ideological affinity with North Korea, that delayed Sino-South Korea rapprochement. In the

same vein, the study posits that it was the gradual Sino-Soviet reconciliation from 1985 onwards that enabled Beijing to reconcile with Seoul. Furthermore, it argues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sudden dissolution of the Eastern bloc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eijing hastily sought to secure a cordon sanitaire and foreclos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ormation of a US - Japan - South Korea anti-China united front by normalizing relations with Seoul.

标题：当北京选择了首尔而不是平壤：重新审视中韩外交关系正常化

摘要：1992年8月24日，中国不顾朝鲜的反对，与韩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为何背弃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而承认韩国？中国希望通过中韩建交得到什么？本研究以之前不为人知的档案资料为基础指出，中韩建交之所以被推迟，不是因为中朝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亲密感，而是因为中国对安全的担忧：被亲苏势力包围的忧虑。本研究认为，正是因为从1985年起中苏关系逐渐缓和，中国才得以发展与韩国的关系。最后，面对东欧国家的解体和苏联的崩溃，中国试图通过与韩国的建交来建立“防疫线”，阻止美日韩三国形成反华统一战线。（标题译文来自编者，摘要译文来自作者）

**Fragmented but Enduring Authoritarianism: Supply-side Reform and Subnational Entrepreneurialism in China's Rail Delivery Services, *The China Quarterly*, First View,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April 2023, pp. 1 - 14.**

Linda Yin-nor Tjia (Affili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reform since 1978 has turned a shortage economy into an economy of overcapacity. To curb the capacity surplus, the government put

forward a sweeping proposal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lthough without any specifics of implementation. This vagueness has resulted in fragmentation between China’s central leadership and local agents. Based on two rail delivery services – China Railway Express Delivery (Zhongtie kuaiyun 中铁快运, CRED) and China – Europe Rail Freight (Zhong – Ou banlie 中欧班列, CERF)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fragmentation in authority has allowed and even encouraged local actors to carve profit-making opportunities out of the excess capacities (including idle assets). In so doing, they give substance to what would otherwise be hollow policy rhetoric. Such subnational entrepreneurialism and the resulting tacit dynamics between state and local-level actors add another layer to the fine-grained theorization of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despite fragmentation, 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endures, but with outcomes now shaped by a cyclical process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re-centralization as well as continuous central – local interplay.

标题：分散但持久的威权主义：中国铁路货运服务中的供给侧改革和地方企业家精神

摘要：中国自 1978 年改革经济至今，生产资源由“短缺”变为“过剩”。为了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政府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这种模糊的政策促使中央领导和地方人员的权力分裂。本文基于对中铁快运和中欧班列两项铁路货运服务发展的深入研究，提出模糊的权力分裂，有助激励地方人员利用过剩产能和闲置资产谋利；而在重置生产资源的过程中，同时也演译了原本看似空泛的政策。这种地方企业家精神及其不断与中央互动角力并产生的默契，让我们进一步微调和完善有关中国“碎裂式威权主义”的理论——中国的威权管治在中央和地方出现权力分权的情况下依然历久不衰；然而，中央和地方的持续互动和重复的分权集权过程，却有效地影响着威权管治的结果。（标题译文来自编者，摘要译文来自作者）

**Contesting Master Narratives: Renderings of National History by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First View,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February 2023, pp. 1 - 17.**

Zhaojin Lyu (Affiliation: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Haiyan Zhou (Affiliati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 Abstract

The growing tens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s a cultural aspect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identity. We focus on recent history curriculum changes in the mainland and in Taiwan and find that education authorities on both sides have implemented master narratives for content selection in and organization of history textbooks. In mainland China,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pluralist unity constructs a geographically consistent Chinese nation throughout history, which bolsters the state's current claim to a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cluding Taiwan. In Taiwan,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multiculturalism becomes the essence of Taiwanese identity, and weakens Sinocentrism in Taiwa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标题：挑战主导叙事：中国大陆和台湾对国家历史的描述

摘要：在文化层面，中国大陆和台湾日益紧张的关系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本文关注大陆和台湾历史课纲最新的变化，发现两岸教育主管部门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和组织上都贯彻了主导叙事。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多元一体”的主导叙事构建了一个在历史上具有地理一致性的中华民族，这支持了中国政府目前对包括台湾在内的领土完整的主张。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中，“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导叙事成为台湾人认同的核心要素，削弱了台湾官方史学中的中国中心主义。（标题译文来自编者，摘要译文来自作者）

**From Cold War Geopolitics to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ireless Network Infrastructures (1987 – 2020), *The China Quarterly*, First View,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09 January 2023, pp. 1 - 19.**

Jianqing Chen (Affili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Missouri, US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esis and growth of the current Chinese wireless network infrastructures by pulling together the historical threads of two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tier inter-provincial optical backbone, the “Eight Vertical and Eight Horizontal Fibre-optic Grid,” in the late 1980s and 1990s; and second, the deployment of two broadband-access cellular networks, the third-generation (3G) cellular networks in 2008 and the fourth-generation (4G) networks from 2013 to now, which constitute the wireless network’s edges. I inser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ireless networks since the 1980s into the interconnected global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contextualizing the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in th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traversing the final decade of the Cold War era (the 1980s), the dual global expansion of economic neoliberalism and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since the 1990s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since 2008. This historical inquiry reconciles two historical (meta-)narratives that are not always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 the Chinese narratives grounded on the overarching concept of Chinese post-socialism, and the narratives in Western discourses that often evoke Cold War/post-Cold War dialec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wireless network infrastructures on the basis of commercializ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trades of techno-commodities across borders, challenging the reduced depiction of the Chinese wireless network as an extension, or an

exception, to the West-centred techno-capitalist system.

标题：从冷战地缘政治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国无线网络基础设施的历史 (1987-2020)

摘要：本文探讨当代中国无线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历史。本研究指出中国现今使用的无线通信网络是由两大电信基础设施叠加构成：其核心网络沿用从兴建于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的“八纵八横”大容量光纤通信网；接入网则由 2008 年至 2013 年建成的 3G 移动通信网络和 2013 年建设至今的 4G 移动通信网络共同组成。本文梳理了在互联互通的全球科技环境中，中国无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追溯中美科技合作和竞争从冷战最后十年（80 年代）开始，到经济新自由主义和信息技术的双重国际扩张（90 年代），再到自 2008 年开始的国际资本主义危机，本文将无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历程置于中美科技合作和竞争大背景下，进而调和两种并不完全兼容的历史叙事：即基于中国后社会主义这一框架下的中方叙事和以冷战 / 后冷战为核心辩证逻辑的西方叙事。本文将全球无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化为一系列的技术商业化，跨国技术转让和商品交易，并以此为切入点，挑战了主流观点中两级分化的简单描述，即将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视为以西方为中心的科技资本主义系统的延伸抑或系统之外的孤例。（标题译文来自编者，摘要译文来自作者）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the Pathways of Practice, *Modern China*, Volume 49, Issue 4, pp.408 - 447.**

Shan Zhao (Affili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ree paradigms have dominate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class analysis, modernization, and “public sphere” / “-

civil society” —but all three are imbued with and insist upon a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se paradigms produce an understanding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as part of a Western-styl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itself part of “civil society,” standing in opposition to the state. These misinterpretations were only strengthened by the complete state-ification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after 1949.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trapped in this theoretical pitfall, cannot produce convincing historical research, even with abundant empirical data, nor can they provide experiential mod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Instead, if we focus on practice, we discover that modern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were part of a “third sphere,” an in-between space within the paradoxic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China’s highly centralized government and minimalist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semi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perative within the third sphere reflect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nd mutual shaping at work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rather than a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Applying these insights on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to the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commercial consultative associations” allows us to see that the semiformal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s embedded in the “third sphere” continue to quietly operate, which has immense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标题：中国商业协会的去、现在与未来：对理论和实践路径的思考

摘要：自 1980 年代以来，三种范式主导了商业协会的历史研究——阶级分析、现代化和“公共领域”/“公民社会”——但这三个范式都充满了并坚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些范式产生了一种理解，即商业协会是西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与国家相对立。这些误解在 1949 年后中国商业协会的完全国

家化中得到了加强。陷入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业协会历史研究，即使有丰富的实证数据，也无法产生令人信服的历史研究，也无法为当代商业协会的发展提供经验模型。相反，如果我们关注实践，我们会发现现代商业协会是“第三领域”的一部分，这是中国高度集权的政府和极简主义行政体系的矛盾制度框架内的一个中间空间。在第三个领域运作的半正式治理机制反映了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塑造，而不是它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将这些关于商业协会历史的洞见运用到当代“商业咨询协会”的实践中，让我们看到嵌入“第三领域”的半正式行政传统仍在悄然运转，这对中国商业协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编者译）

**The Ongoing Business of Chinese-Language Reform: A View from the Periphery of Hong Kong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Modern China*, Volume 49, Issue 4, pp. 448 – 479.**

John D. Wong (Affiliation: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aculty of Art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Hong Kong).

Andrew D. Wong (Affili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 Hayward, CA, US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Mandarin, once an unproblematic link to a nebulous Chinese nation for Hongkongers, now reflects anti-mainland sentiments. In the 1970s, Hong Kong Chinese who fought against English colonial oppression embraced Cantonese as their de facto Chinese language even as some conceded the broader allure of Mandarin. As the popularity of Cantonese rose, the appeal of Mandarin lingered but did not result in its higher currency. In the

period leading up to the 1997 handover, whil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did not mandate the study of Mandarin, its economic practicality surged, especially as the reform era engineered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for Hongkongers in the mainland. Ironically, as Hongkongers have registered enhanced Mandarin proficiency, mounting resentment toward Mandarin in the cit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has come to represent a response to intensifying mainland control over Hong Kong.

标题：汉语改革进行时：过去半个世纪香港边缘的观点

摘要：在香港“中文”含义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普通话——曾经是香港人与模糊的中华民族之间的联系，现在如何反映反大陆情绪的。在1970年代，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香港华人将粤语作为他们事实上的“中文”，尽管有些人承认普通话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随着粤语的普及，普通话的吸引力依然存在，但并没有导致其更高的价值。在1997年回归之前的时期，虽然殖民政府没有强制要求学习普通话，但其经济实用性激增，尤其是在改革时期为香港人在大陆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香港人的普通话水平不断提高，过去二十年来，香港对普通话的不满日益增加，这也是对大陆加强对香港控制的回应。（编者译）

**Militarization as Personal Cultivation: Student Military Training in Guomindang China, 1928 – 1937, *Modern China*, Volume 49, Issue 4, pp. 480 – 514.**

Sau-yi Fong (Affiliation: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USA)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Guomindang's (GMD's) on-the-ground implementation of its student military training program,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ideological tensions and diplomatic predicaments underlying the party-state's youth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While fetishizing a regimented society, the program incorporated a heterogeneous set of tactics to both inspire and control youth martial activ-

ism. The peculiar mix of military discipline, Confucian modes of education, and liberal ideals of voluntarism and competition gave rise to multifarious experiences and sentiments that muddled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state—to convert military training into a form of personal cultivation.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gap between Chiang Kai-shek's conception of militariz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discipline and Chinese students' embrace of military training as patriotic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Ultimately, the program's mobilizational potential was undercut by its obsession with managing the trivialities of everyday life and Nanjing's appeasement policy toward Japan.

标题：作为个人修养的军事化：1928-1937年中国国民党学生军事训练

摘要：通过考察国民党对其学生军事训练计划的实地执行情况，本文探讨了党国青年动员战略背后的意识形态紧张局势和外交困境。在迷信制度化社会的同时，该计划纳入了一套异质的策略来激励和控制青少年的军事行动主义。军事纪律、儒家教育模式以及自愿和竞争的自由主义理想的特殊组合，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经验和情感，混淆了国家的主要目标，即把军事训练转化为一种个人修养的形式。本研究揭示了蒋介石将军事化视为日常纪律实践的概念与中国学生将军事训练视为爱国主义抵抗日本侵略之间的差距。最终，该计划的动员潜力被其对管理日常生活琐事的痴迷和南京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所削弱。（编者译）

**Cultural Interaction under State Expansion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Changes in Marriage and Reproductive Practices in Yunnan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Modern China*, Volume 49, Issue 3, pp. 320 – 354.**

Wen-Yao Lee (Affili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Kansas, Lawrence, Kansas, US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arriage institution's disintegration and the resulting diversification of reproductive practices in Pumi (Premi) villages in Yongning, northwest Yunnan. Yongning Pumi currently practice formal marriages, visiting relationships, and cohabitation without marriage. I argue that this diversity has resulted from both the expansion of state intervention and local individuals' agency to fulfill cultural ideals and personal desires. The changing economic-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Pumi and Mosuo (Na), whose elites ruled Yongning as native officials 土官 authoriz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jointly contributed to Pumi's acceptance of visiting relationships. The popularity of visiting relationships in Yongning reflects the decline of the local status-differentiation system exemplified in divergent forms of marriage and reproductive relations. Moreover, the increasing commonalities and similarities of diversification in Pumi and Mosuo reproductive and residential practices are symptomatic of the region's further incorporation into a larg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标题：汉藏边疆地区国家扩张下的文化互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云南婚姻和生育习俗的变化

摘要：本文描述了云南西北部永宁普米族村落中婚姻制度的解体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样化的生殖实践。永宁普米族目前有正式婚姻、探亲关系和非婚同居。我认为，这种多样性是由国家干预的扩大和当地个人实现文化理想和个人愿望的机构造成的。十九世纪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普米族与摩梭族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摩梭族的精英作为朝廷授权的土官统治着永宁，共同促成了普米族对探亲关系的接受。探亲关系在永宁的流行反映了当地地位差异体系的衰落，这种差异体现在不同形式的婚姻和生殖关系上。此外，普米族和摩梭族在生育和居住习俗方面日益增多的共同点和相似性，表明该地区进一步融入了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

**Rural Reform in Republican China: Christian Women, Print Media, and a Global Vision of Domesticity, *Modern China*, Volume 49, Issue 3, pp. 355 – 385.**

Yun Zhou yun (Affiliation: School of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ustrali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hristian efforts to modernize rural women, who were placed at the center of rural reform in Republican China in the 1920s. Rural women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untapped force for change in rural communities. The Christian magazine *Nüxing* 女星 (Woman's Star), launched in 1932, reached out to this group. Through a new model of rural womanhood, a figure called Mrs. Wang, the magazine demonstrated how rural women could transform local communities through domesticity and Christian faith. The modern model of rural womanhood promoted by *Nüxing* emerged as a part of a global Christian movement in which creating Christian households was the primary goal. The magazine thus represents the integration of a marginalized group of women into a global community founded on shared domestic concerns and spiritual practices. *Nüxing* reveals how rural women, as historical agents of change, were connected to rural reform 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and to a global collective of Christian domestic womanhood.

标题：民国时期的农村改革：基督教妇女、印刷媒体和家庭性的全球视野

摘要：本文探讨了基督教对农村妇女现代化的努力，她们在 1920 年代被置于中国农村改革的中心。农村妇女是农村社区变革的一支重要的、尚未开发的力量。1932 年创办的基督教杂志《女星》向这个群体伸出了橄榄枝。该杂志通过一个新的农村妇女模式，即一个被称为王夫人的人物，展示了农村妇女如何通过家庭生活和基督教信仰来改变当地社区。《女星》提倡的现代农村妇女模式是作为全球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出现的，在这

场运动中，创建基督教家庭是首要目标。因此，这本杂志代表了一个边缘化的妇女群体融入了一个建立在共同的家庭关注和精神实践基础上的全球社区。《女星》揭示了农村妇女作为变革的历史推动者，是如何与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国家建设以及全球的基督教家庭妇女集体联系起来的。  
(编者译)

**Official Media as Emotional Valves: How Official Media Guides Nationalism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Asian Survey*, 12 May 2023, pp.1 – 30.**

Fangzhu (Affiliation: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Zhongbin Huang (Affiliation: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Tianguang Meng (Affili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Social media is the most popular platform for the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and it is a critical channel through which researchers can observe the dynamics and patterns of public opin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by focusing on how official media shapes mass nationalism in Cyber China. Analyzing 26 million Weibo posts mad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we found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nationalism among user types, localities, and stages of the pandemic.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we found that the official Chinese media did not always play the expected role of promoting nationalism; instead, it acted as a system of emotional valves that channeled social sentiment. Official media is intended to stabilize social sentiment and prevent social unrest, and nationalistic news stories are used to draw attention away from domestic problems.

标题：官方媒体作为情感阀门：官方媒体如何引导中国社交媒体上

的民族主义

摘要：社交媒体是最受欢迎的舆论表达平台，也是研究者观察舆论动态和模式的重要渠道。本研究通过关注官方媒体如何塑造网络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来探索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起源。通过分析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2600万条微博，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在用户类型、地方和大流行阶段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们发现中国官方媒体并不总是扮演着促进民族主义的预期角色；相反，它充当了引导社会情绪的情感阀门系统。官方媒体旨在稳定社会情绪，防止社会动荡，而民族主义的新闻故事则被用来吸引人们对国内问题的关注。（编者译）

**The “Party Branch Established in the Wat” : So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Authorities and Religion in the Theravada Buddhist Community of South-west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21, Number 1, February 2023, pp. 45-69.**

Xiong Hao (Affiliation: Fud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nhanced its local presence by establishing a branch in the Theravada Buddhist wat in Dehong. Such direct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a religious venue, however, does not lead to grievances from the local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if the purely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can be well managed at the local level, the religion and the Party can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maintain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state - religion antagonism paradigm and argues that an alternative paradigm—an interests-based paradigm—should be prioritised when study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标题：中国西南佛教社区中地方政府与宗教之间的社会合作

摘要：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德宏州的小乘佛教寺院建立分支机构来加强其在当地的存在。然而，这种在宗教场所的直接政治参与，并没有导致当地人的不满情绪。本文发现，如果能在地方上很好地处理纯粹的意识形态差异，那么宗教和党就可以相互合作，保持和谐的关系。本文对国家与宗教对立的范式进行了反思，认为在研究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关系时，应该优先考虑另一种范式——基于利益的范式。（编者译）

**Survival through Pragmatic Thinking: Revisiting the Untold Stories behind the Canada – China Grain Trade, 1960 – 63,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21, Number 1, February 2023, pp. 160-176.**

Liu Yun (Affili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untold stories behind the Canada – China grain trade in the 1960 – 63 period. According to some archived records of Canadian business proceedings that have yet barely been examined, non-state agents in both nations took joint initiatives to deliver these grain sales, demonstrating pragmatic attitudes to de-escalate political tensions. Despite intensive disputes that persistently sabotaged trade normalisation, many actors devoted tireless efforts consistent with the future trend of public diplomacy. Acting on behalf of local civil societies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s, Canadian wheat trade agents facilitated effective two-way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The emphasis on common interests, rather than on ideological assertion, helped to contain political distrust with “de-othering” narratives. Increased engagement by civilian stakeholders thus served to hedge against political risk exposures.

标题：通过务实的思考求得生存：重新审视加中粮食贸易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1960-63

摘要: 本文探讨了 1960-63 年期间加中粮食贸易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根据一些几乎没有被研究过的加拿大商业诉讼记录, 两国的非国家代理人采取了联合行动来实现这些粮食销售, 表现出缓解政治紧张局势的务实态度。尽管密集的争端持续破坏贸易正常化, 但许多行为者做出了符合未来公共外交趋势的不懈努力。加拿大小麦贸易代理人代表当地民间团体和商业协会, 促进与中国同行的有效双向沟通。对共同利益的强调, 而不是对意识形态的主张, 有助于通过“去他者化”的叙述来遏制政治上的不信任。因此, 增加民事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有助于对冲政治风险。(编者译)

## ○ 图书

Youwei Xu and Y. Yvon Wang. Cham. *Everyday Lives in China's Cold War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Voices from the Shanghai Small Third Front, 1964 - 1988*,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Springer Nature, 2022. xxvii + 371pp.

Description:

This book translates and contextualizes the recollections of men and women who built, lived, and worked in some of the factory compounds relocated from China's most cosmopolitan city—Shanghai. Small Third Line factories became oases of relatively prosperous urban life among more impoverished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These accounts, plus the guiding questions, contextual notes, and further readings accompanying them, show how everyday lives fit into the sweeping geo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Furthermore, they reveal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ilitary-industrial strategies have shaped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post-Mao era. The approachable translations and insight into areas of life rarely covered by political or diplomatic histories like sexuality and popular culture make this book highly accessible for classroom use and the general-interest reader.

《冷战时期中国军工联合体的日常生活：来自上海小三线的声音，1964-1988》

简介：本书翻译了从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迁来的一些工厂大院中建造、生活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的回忆，并对其进行了语境化。小小的三线工厂成为更贫困的农业社区中相对繁荣的城市生活的绿洲。这些叙述，加上指导性问题和背景说明和随附的进一步阅读，显示了日常生活是如何融入冷战时期中国和世界彻底的地缘政治变化的。此外，它们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业战略如何在后毛泽东时代塑造了中

国的经济和社会。平易近人的翻译和对政治或外交史很少涉及的生活领域（如性和流行文化）的深入了解，使这本书非常易读。（编者译）

**Jeffrey A. Javed. *Righteous Revolutionaries: Morality, Mobilization, and Violence 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312pp.**

Description:

*Righteous Revolutionaries* illustrates how states appeal to popular morality—shared understandings of right and wrong—to forge new group identities and mobilize violence against perceived threats to their authority. Jeffrey A. Javed examin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ass mobilization of violence during its land reform campaign in the early 1950s, one of the most violent and successful state-building efforts in history. Using an array of novel archival, documentary, and quantitative historical data, this book illustrates that China’s land reform campaign was not just about economic redistribution but rather part of a larger, brutally violent state-building effort to delegitimize the new party-state’s internal rivals and establish its moral authority. *Righteous Revolutionaries*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Party-state simultaneously removed perceived threats to its authority at the grassroots and bolstered its legitimacy through a process called moral mobilization. This mobilization process created a moral boundary that designated a virtuous ingroup of “the masses” and a demonized outgroup of “class enemies,” mobilized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violence against this broadly defined outgroup, and strengthened this symbolic boundary by making the masses complicit in state violence.

《正义的革命者：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道德、动员和暴力》

简介：《正义的革命者》阐述了国家如何利用民众的道德——对是非的共同理解——来塑造新的群体身份，并动员暴力来对抗对其权威的

威胁。杰弗里·A·贾韦德 (Jeffrey A. Javed) 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 1950 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大规模暴力动员，这是历史上最暴力和最成功的国家建设努力之一。本书利用一系列新颖的档案、文献和定量历史数据，说明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再分配，而是一个更大、更残酷的国家建设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新党国的内部竞争对手失去合法性并建立其道德权威。《正义的革命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基层消除了对其权威的威胁，并通过一个被称为道德动员的过程增强了其合法性。这一动员过程创造了一个道德界限，指定了一个由“群众”组成的善良群体和一个由“阶级敌人”组成的妖魔化的非群体，动员群众参与针对这个广泛定义的非群体的暴力，并通过使群众成为国家暴力的同谋来加强这一象征性界限。(编者译)

**Anne E. McLaren. *Memory Making in Folk Epics of China: The Intimate and the Local in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22. 360pp.**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first major English-language monograph on the largely ignored singing tradition of the Han Chinese folk epics performed by illiterate men and women in the regions around Lake Tai, known as the Wu-dialect speaking zone of the lower Yangzi delta. For the villagers of Lake Tai, all songs, whether they be short or long, lyrical or narrative, are called “mountain songs” or shange. Singing shange had been an integrated part of villagers’ everyday life in this region since ancient times. Its significance, however, was grossly disregarded in Chinese written records and undermin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have tended (even nowadays) to perceive the cultural forms transmitted orally as “vulgar.” It was not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s a response to Western imperial invasion, that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an to look into folk culture for the roots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e folksong collecting movement led by Gu Jiegang in the 1920s was representative of such efforts. This folklore movement was soon disrupted by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civil wars. The next wave of folklore revival movement occurred in the early 1980s as a response to the massive destruction of traditio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 - 1976). The focus of this book is the change that were “discovered”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long narrative songs (ranging from 2,000 to 20,000 lines) that were familiar to Wu-speaking populations in pre-contemporary China. The lengthy song narratives had been considered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of the borderland ethnic groups, instead of the Han Chinese. McLaren’s study of these long narrative songs among the Han Chinese in the Lake Tai area is therefore pioneering and extremely important: it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regional diversities of the Ha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nd the pan-Chinese culture.

《中国民间史诗中的记忆制作：中国地域文化中的私密性和地方性》

简介：这是第一部关于汉族民间史诗中被忽视的歌唱传统的重要英文专著，这些歌唱传统由太湖周围地区的文盲男女表演，该地区被称为长江下游的吴语区。对于太湖的村民来说，所有的歌曲，无论长短，抒情的还是叙事的，都叫“山歌”。自古以来，唱山歌是这个地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它的重要性在中国的书面记录中被严重忽视，并被中国知识分子所破坏，他们倾向于（即使在今天）将口头传播的文化形式视为“庸俗”。直到20世纪初，作为对西方帝国入侵的回应，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民俗文化中寻找中国民族认同的根源：顾颉刚在1920年代领导的民歌收集运动就是这种努力的代表。这种民俗运动很快被甲午战争和内战所打乱。下一波民俗复兴运动发生在1980年代初，作为对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对传统的大规模破坏的回应。本书的重点是20世纪后期“发现”的山歌，尤其是前当代中国吴语人群所熟悉的长叙事歌曲（2000行到2万行不等）。长歌叙事曾被认为是边

疆民族群体而非汉族的文化表现特征。因此，作者对太湖地区汉族人中的这些长篇叙事歌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也是极其重要的：它提供了对汉族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以及当地与泛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见解。（编者译）

**Lei X. Ouyang. *Music as Mao's Weapon: Remembe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rbana, Chicago and Springfiel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22. xvii + 198 pp.**

Descriptio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produced propaganda music that still stirs unease and, at times, evokes nostalgia. Lei X. Ouyang uses selections from revolutionary songbooks to untangl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memory, trauma, and generational imprinting among those who survived the period of extremes. Interviews combine with ethnographic fieldwork and surveys to explore bo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effect on those who lived through it as children and contemporary remembrance of the music created to serve the Maoist regime. As Ouyang shows, the weaponization of music served an ideolog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revolutionized the senses. She examines essential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phenomenon, including: What did the revolutionization look, sound, and feel like? What does it take for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o engage with such music? And what is the impact of such an experience over time? Perceptive and provocative, *Music as Mao's Weapon* is an insightful look at the exploit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the art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音乐作为毛的武器：回忆文化大革命》

简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制作的宣传音乐仍在激起人们的不安，有时还能唤起怀旧情绪。欧阳（Lei X. Ouyang）用革命歌曲集的选段，解开那些在极端时期幸存下来的人之间的记忆、创伤和代际印记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访谈与民族志田野调查和调查相结合，探讨文

化大革命对儿童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的影响，以及当代对为毛主义政权服务的音乐的记忆。正如欧阳所表明的那样，音乐的武器化为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服务，但也彻底改变了感官。她研究了这一现象所引起的基本问题，包括：革命的外观、声音和感觉是什么？个人和团体如何参与这些音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历会产生什么影响？（编者译）

**B. Michael Frolic. *Canada and China: A Fifty-Year Journey*,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2. xii + 442 pp.**

Description:

Presenting a thorough record of Canada's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Canada and China recounts ten stories regarding China policy decisions made by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ese decisions describe key bilateral moves, beginning with Pierre Trudeau's recognition of China in 1970 and ending fifty years later with his son Justin's attempt to reset a struggl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Rooted in archival research,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s a policy observer, the book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Canada-China relationship has developed over time and how best to position Canada in future relations with China.

While present-day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complicated, the book deliberately seeks to provide a balanced perspective by showing both the positive and the more challenging aspects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加拿大与中国：五十年的旅程》

简介：本书全面记录了加拿大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讲述了有关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决定的十个故事。这些决定描述了关键的双举措，从1970年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承认中国开始，到50年后他的儿子贾斯汀试图重启与中国的艰难关系为止。

本书植根于档案研究、广泛的访谈和作者作为政策观察者的经验，

有助于我们了解加中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以及如何在未来与中国的关系中为加拿大作出最佳定位。

虽然现今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但本书有意通过展示与中国关系的积极方面和更具挑战性的方面来提供一个平衡的视角。（编者译）



当代文献史料沙龙 15

“民间文献”系列 2

—— 政协文史资料的起源、发展及特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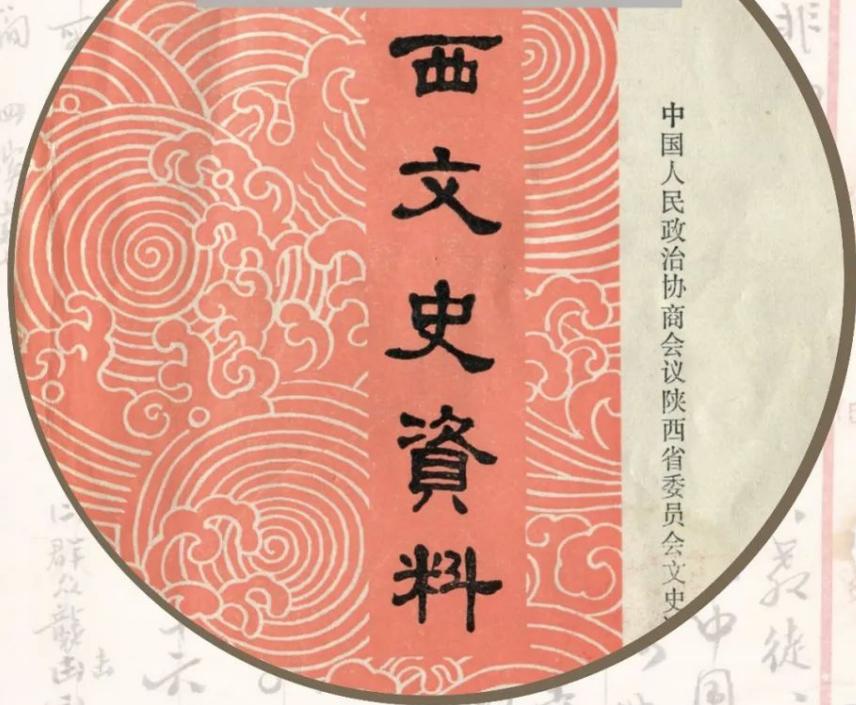
主讲 白磊

陕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陕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

主持 满水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2023年5月10日14:00—16:00



线下：华东师大（闵行）图书馆1209会议室

线上：腾讯会议：244376428 会议密码：485935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当代文献史料中心



## 当代文献史料沙龙 16

“年谱阅读”系列 6

### — 讨论文本 —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1954年度

导读 王晨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2023年5月17日 11:45—14:00



线下：华东师大（闵行）图书馆1209会议室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当代文献史料中心



当代文献史料沙龙 17

“年谱阅读”系列 7

— 讨论主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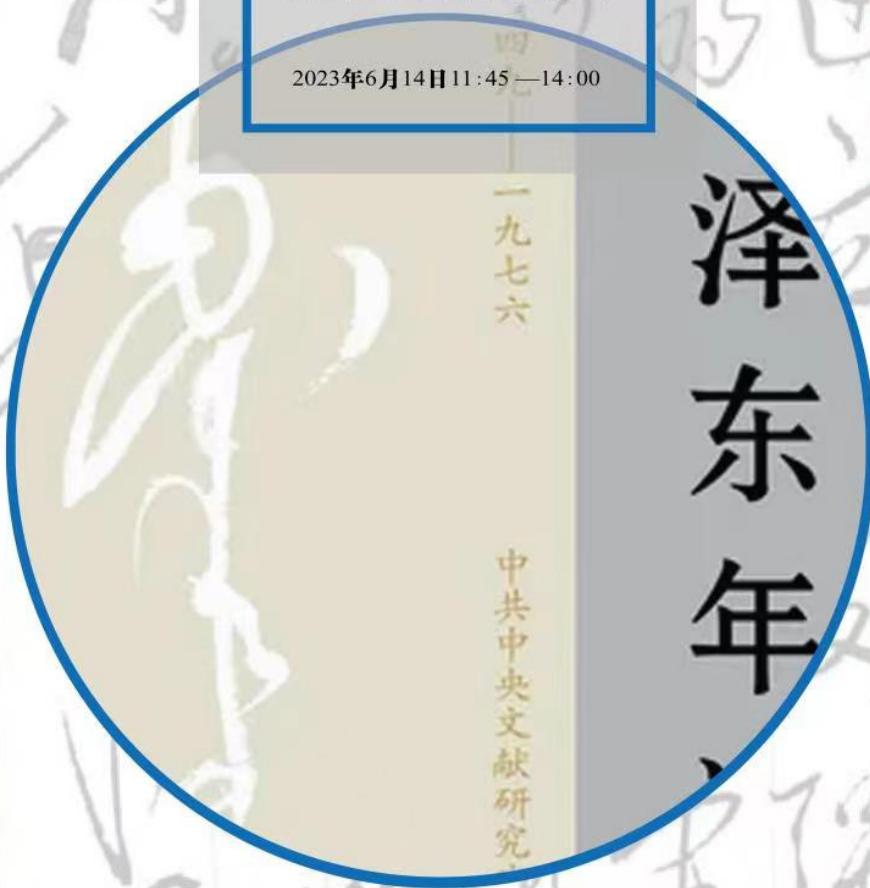
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发现历史

——研读心得与体会

导读 李嘉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23年6月14日 11:45—14:00



线下：华东师大（闵行）图书馆1209会议室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当代文献史料中心



第二届当代文献史料论坛

The Second Forum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 基层档案中的 当代中国社会

时间

2023年6月30日-7月2日

地点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承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当代文献史料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Academy of History and Documentation of  
Social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